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War, Peace and Beyond:
War Memories in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战争，和平，及其以外：新华文学中的战争记忆

XIA YUANGE

夏元格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2023

War, Peace and Beyond:
War Memories in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战争，和平，及其以外：新华文学中的战争记忆

XIA YUANGE

夏元格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2023

Supervisor Declaration Statement

I have reviewed the content of this thesis an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t does not contain plagiarised materials. The presentation style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what is expected of the degree awarde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research and writing are those of the candidate except as acknowledged in the Author Attribution Statement. I confirm that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ics policies and integrity standard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research data are presented hones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NTU NTU NTU NTU NTU NTU NTU NTU

NTU NTU NTU NTU NTU NTU NTU NTU

Date:	24 Oct 2023
Name of Supervisor:	Zhang Songjian
Signature of Supervisor:	

致谢

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恰伴随着世界重新开启，步入原本轨道的阶段。历史可见地穿梭于过去、当下和未来，在这种永恒地发生着的延展之中，我也一样地继续着旅程。

这一段旅途能够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松建教授。从最初的论文选题、确定整体框架，到对于文本的分析，行文的修改，至成文后细节部分的雕琢，张老师都给予了悉心的指导。无论是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深沉热切的人文关怀，还是慷慨真诚的建议与鼓励，都使我受益良多。

同时也要感谢中文系的每一位老师，成为我求学途中的引路人，以不遗余力的教学热忱和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传授知识与方法，激发了我对更深层学习与研究的向往。

我也要感谢一直陪伴着我的家人和朋友，有了你们的支持和爱护，我亦会有更多的精彩旅途。

目录

致谢	i
目录	ii
摘要	iii
SUMMARY	iv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动机	1
二、研究现状	2
三、研究方法	4
四、论文结构	5
第二章 战争与女性.....	6
一、性暴力受害者	6
二、母亲	12
三、敌方女性	17
第三章 战争与民族认同.....	22
一、中国认同	24
二、新加坡认同	31
第四章 战争、记忆与遗忘.....	43
一、作为“历史记忆”的战争	44
二、记忆与场所	52
三、记忆与遗忘	56
第五章 总结	61
参考文献	66

摘要

新加坡在太平洋战争中经受了三年六个月的黑暗时代，构成了历史创伤和国族记忆，也是战后至今的文化实践和文学艺术的一部分表现内容。亲历新加坡战事的本地作家在作品中，如实地描述了战时新加坡遭受轰炸，人们经历检证的惨烈场景，以此记录人民苦难，抨击入侵者的罪行。未经历战争的作家则以文字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回溯战争事实，反思当下所见的扭曲与遗忘。本论文综合考量时期、题材等多种因素，择选《灵戏》、《忌日》、《秀子姑娘》、《窝浪拉里》、《在血泊中微笑》、《云翳》、《红雾》、《火浪》、《芭洋上》、《退刀记》、《异质伤口》、《横田少佐》、《认真面具》、《布拉岗马地》及《我的来世不是梦》十五个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历史背景与理论框架，从女性主义、民族认同、历史记忆三个方面，剖析不同作品的战争叙事，以冀在历史、文本和理论间展开对话，勘察新华文学中的战争记忆对于战争、和平、性别、认同、记忆等课题的省思，钩沉更为深层的意义与价值。

SUMMARY

Singapore endured a dark age of 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 during the Pacific War, which constituted the historical trauma and national memory, as well as a part of the cultural and literary practice, from the post-war to the present. Local writers who lived through the war in Singapore described the horrific scenes of the bombing and the Sook Ching in their works to record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and denounce the crimes of the invaders. Writers who did not experience the war use the text as the carrier of historical memory, recalling the facts of the war and reflecting on the distortion and forgetting that they observe nowadays. With considerations of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period of creation and subject matter, the following 15 works are selected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of this paper: *"Ling Xi"*, *"Ji Ri"*, *"Xiu Zi Gu Niang"*, *"Wo Lang La Li"*, *"Zai Xue Po Zhong Wei Xiao"*, *"Yun Yi"*, *"Hong Wu"*, *"Huo Lang"*, *"Ba Yang Shang"*, *"Tui Dao Ji"*, *"Yi Zhi Shang Kou"*, *"Heng Tian Shao Zuo"*, *"Ren Zhen Mian Ju"*, *"Bu La Gang Ma Di"* and *"Wo de Lai Shi Bu Shi Meng"*.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war narratives of different work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femin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dialogue within history, text and theory. This paper also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flection of war memories in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in aspects of war, peace, gender, identity, memory as well as other topic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动机

新加坡的战争记忆是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它传承自见证了新加坡沦陷、经历了日占时期的先驱一代。他们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审视时代变化的机会，且年轻一代也能够了解这段充满创伤和变革的新加坡历史的同时，持续地与之展开对话。¹

新加坡在太平洋战争中经受了三年六个月的黑暗时代，构成了历史创伤和国族记忆，也是战后至今的文化实践和文学艺术的一部分表现内容。本文旨在结合文学文本、历史叙事和理论论述，对新加坡华文文学中的战争记忆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对东南亚展开了侵略战争。一面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一面向马来亚发动闪电攻势。日军兵分三路，同时在泰国的宋卡和北大年及马来亚的道北登陆。八日凌晨四时，新加坡天还未亮，三队日机，共约三十余架，飞临市区和实里达与丁加基地实行轰炸。这是新加坡开埠以来第一次成为战场。彼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历四年多，欧洲方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已达两年余。在东南亚方面，日军已占领了法属安南，随时可以向附近的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进攻。翌年一月中旬，马来亚战事恶化²，日军于二月一日展开攻势，轮番轰炸新加坡岛东北部。十四日，日军坦克车队进迫市区，蓄水池陷落，饮水被控制。十五日，英军白思华中将肩荷白旗至武吉知马向日军司令山下奉文递投降书。³丘吉尔将驻新加坡的英军投降称为“最大的灾难”⁴，此次战败使得“新加坡堡垒”坚不可破的传说幻灭，一

¹ 此为新加坡沦陷八十周年之际，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乱离时代：一九四二年新加坡沦陷时期的回顾与意义》展览之导言。Rachel Eng, Syafiqah Jaaffar, Iskander Mydin, *Dislocations: Memory & Meaning of The Fall of Singapore, 1942*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2022), p.7.

² 南洋商报《新加坡一百五十年》（新加坡：嘉华印刷有限公司，1969），页 45-53。

³ 邱新民《日本占领新加坡史话》（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1990），页 25-26。

⁴ Joseph Kennedy, *British Civilians and the Japanese War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7), p.1.

九四二年被永远地烙印在新加坡的历史之中⁵。新加坡沦陷后，被改名为“昭南岛”，日军即实施“大检证”，针对抗日华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大屠杀，凡年纪在十八岁至五十岁的男子，集中于指定地点，如被认为是良民，给予安居证释放，否则赶上罗哩车，一去不回。谢松山的《血海》诗说：“榜鹅卜卜闻枪声，惨痛哀号不忍听，死后投尸葬鱼腹，精魂夜夜泣残更。”⁶由于日方蓄意篡改和掩盖历史，对于真实的罹难人数，至今仍未调查清楚。

新华作家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这段伤痛的历史进行了记录与叙述。《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等论著，对战时抗日文运及战后历史反思的本地及南来作家作品，已有了详尽的收录与整理。而本文所要关注的，则是文本中对于战争暴力及其心理、社会、文化后果的具体呈现视角，继而观察其对于战争课题持续且多样的思索。新华文学中的战争记忆因不同的时期、身份等因素，尤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自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后，新马侨民便积极投身救亡的大业，南来作家书写中国及南洋的抗战故事之余，亦撰文呼吁马来亚文化人尽可能推动南洋的启蒙运动，以号召更多侨生觉醒起来，参加援助。而随着日军入侵新加坡，文艺界的口号从“反侵略文艺运动”变为“抗日卫马（新）”，华人的本地认同日渐强烈。战后，文学中视南洋为家园的“建国”意识开始萌生。⁷亲历新加坡战事的本地作家在作品中，如实地描述了战时新加坡遭受轰炸，人们经历检证的惨烈场景，以此记录人民苦难，抨击入侵者的罪行。并未经历战争的作家则以文字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回溯战争事实，反思当下所见的扭曲与遗忘。可见战争记忆在新华文学的书写中，具备着错综复杂、跨越时空的多重意义。本文旨在结合历史背景与理论框架，从女性主义、民族认同、历史记忆三个方面为切入，剖析不同作品的战争叙事，以冀在历史、文本和理论间展开对话。

二、研究现状

新华战争文学目前并无单独的梳理分类，而是需将其置于新华文学的发

⁵ Rachel Eng, Syafiqah Jaaffar, Iskander Mydin, *Dislocations: Memory & Meaning of The Fall of Singapore, 1942*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2022), p.10.

⁶ 邱新民《日本占领新加坡史话》，页 37-41。

⁷ 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页 108。

展脉络中整体观之。从一九三七年的卢沟桥事变至一九四二年的新加坡沦陷这一时期，《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马华新文学简史》中可见清晰的时间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的抗日文运兴盛时期，新加坡的小说队伍中聚集起了三部分人，一是从中国南来的作家，二是本地的小说新秀，三是老一辈的写作人，他们在创作上都热情呼应着抗战的战斗召唤，在刚健明了的创作氛围中写下了大量抗战小说，一些力作有深邃的历史感和沉郁的现实批判。⁸前期的抗战小说催生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之下，至一九四一年日本挥军南进，马华文艺工作又被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负起了更加紧要迫切的任务——抗日卫国的短兵相接的战斗。经过了这段马华新文学的繁盛时期，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新加坡沦陷，马华文艺活动又完全沉寂下来。⁹《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将一九四五至一九七零年间的马华文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战后初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紧急状态初期（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反黄运动时期（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及星马独立前后（一九五七至一九七零）¹⁰，但相较抗日文运兴盛时期，战后的战争文学并未在某一时期有集中的体现，而是散布于不同阶段，因此难以依照准确的年份划分，故本文亦不采取时间线的方式对其进行归类与排序，而以历史和文学发展阶段为背景，具体关注每个文本对于战争的呈现。

不过，关于战争的一般研究，国际学界已有丰富的理论探讨。《战争论》¹¹通过对于战争现象实质的研究，致力于阐释战争的本性、战争计划、军队与防御等与战争密切关联的课题，其不追求构建出一套“系统的、饱含思想和内容的战争理论”，而是着重于将对于战争的明确思考作为“素材”进行展示，系理解战争相关概念的坚实基础。而如《秩序、失序与战争：社会适应与社会责任》¹²、《战争与暴力社会学》¹³、《战争中没有女性》¹⁴、《记忆、历史、遗忘》

⁸ 《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页 111。

⁹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新加坡：万里书局，1974），页 149, 169。

¹⁰ 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新加坡：东艺印务公司，1978），页 1。

¹¹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陈川译《战争论》（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

¹² 罗伯特·莱顿著，魏澜，纳日碧力戈译《秩序、失序与战争：社会适应与社会信任》（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

¹³ 锡尼萨·马莱斯维奇著，田宏杰等译《战争与暴力的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¹⁴ 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战争中没有女性》

¹⁵、《死亡、战争与献祭》¹⁶等诸多著作，则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女性主义、神话研究等各个方面，对战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但将之同新华战争文学相结合的研究，目前尚有较强的空缺。同上文所述，新华战争文学多整理于综述类著作，按照创作时间或作者编排，仅有少量以战争主题为集合，于二零二零年出版的《〈一个日本女间谍〉新马反法西斯小说选集》为其中一本，收录十二篇抗战时期的反侵略作品，以文集形式呈现。总的来说，该领域的研究处于文本、史料、理论较为分离的状态。因此本文将在综合考量时期、题材等多种因素，对文本进行择选的基础上，借助理论勘察其对于战争的审视与思索，钩沉更为深层的意义与价值，为新华战争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种参考视角。

三、研究方法

在理论方面，本文将综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记忆（包括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等理论框架，以多样化的切入点解读文本，探析战争主题下其对于性别、身份、认同、创伤、景观等具体内容的关注。在方法上，本文则采取：

1) 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方法，在每一章节对相关文本进行集中探讨，综合历史考证及理论运用，完成对所选取文本之解析，以具体个案为切入，观察新华文学中战争记忆的多样性；

2) 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的方法，深入理解文本对于人物、情节、对话、场景的设计，挖掘同史料与真实经历的映照，继而进一步明晰其书写战争、思考战争的视角；

3) 图书馆研究（Library Research）的方法，通过对图书馆资料、电子数据库资料、展览音像资料的收集、阅读和观览，以书籍、报刊、展览、录像等多方位的资料为参考依据，爬梳新华文学中含括战争记忆的文本，择选可用的理论框架，以宏观之考量，察细处之呈现；

4) 历史化（Historization）、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的方法，回溯相应的

¹⁵ 保罗·利科著，李彦岑，陈颖译《记忆，历史，遗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¹⁶ 布鲁斯·林肯著，晏可佳译《死亡、战争与献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历史事件与文学发展阶段，考察文本中独特的在地性和认同变化等课题，在亲历与招魂，原乡与本土，传承与遗忘之中，厘清新华文学中战争记忆的线索，接近其所要指向的意义与省思。

四、论文结构

本文将分作五章，对新华文学中的战争记忆进行爬梳与剖析。

第一章，即本章绪论，对研究动机、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进行阐述和整理，并说明论文结构。

第二章，探讨战争与性别的关系，梳理女性主义对战争问题的见解与批判，通过理论论辩和历史考证，对新华战争文学中的性暴力受害者、母亲及敌方女性三类女性形象进行解析，具体个案为郭宝崑《灵戏》中的“姑娘”，苗秀《忌日》中的“老太”，姚紫《秀子姑娘》中的秀子和《窝浪拉里》中的兰娜。

第三章，考察民族认同，就作者、文本和历史背景为参照，勘察新华战争文学中所体现之中国认同与新加坡认同，择选中国题材、新加坡华侨救亡题材、新加坡本土题材、及描绘战时南洋景观的文本，探讨其中对于家国与认同的多方位书写。具体个案为流冰的《在血泊中微笑》和《云翳》，苗秀的《红雾》和《火浪》，以及赵戎的《芭洋上》。

第四章，研究后殖民新加坡的历史遗忘症，关注从后世的角度出发，挖掘已经成为“记忆”的战争中所承载之历史与创伤的文本，以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多重考量，观察文本对于过去与当前、真相与掩盖、记忆与遗忘之审视。具体个案为希尼尔的《退刀记》、《异质伤口》、《横田少佐》、《认真面具》、《布拉岗马地》及《我的来世不是梦》。

第五章，总结章，笔者综合本文的研究进行总结，梳理新华文学中战争记忆的呈现与意义。

第二章 战争与女性

新华文学中的战争与女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不单是一个文学课题，而且是一个理论课题。下面的段落首先交代相关的理论论述，然后进入对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

国际关系学家王逸舟曾指出，最能表现出女性主义独特批判的，莫过于它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国际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女性主义者在对其给予强烈关注的同时，也在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种较为普遍的见解，也即激进女性主义的立场是，所谓男性气概和尚武精神，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经常成为一种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强迫力量。妇女常常成了男人战争和其他形式的冲突的牺牲品。“战争不是别的东西，仅仅是男性在‘胜利’欢呼声下有组织安排的杀戮”，“女性是生命热情之源。我们的使命，是令生活的火焰更旺，是令暴力和死亡的威胁消遁”。¹⁷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则认为，依照性别尺度对人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进行简单化的区分和归类有悖于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并从“正义战士”（为国家利益而战的军人）和“美丽心灵”（安守和平家园的平民）这两种极端对立的理想化典型中，发现双方在战争这一交汇点上的契合，意图从根本上破除将“男性的”战争与“女性的”和平相互割裂，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非此即彼的、排他的等级制权力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¹⁸这些涉及诸多角度的不同见解，虽尚未有定论，但为该课题提供了许多可参考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观察到，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关注女性与战争这一课题，而在新华文学的研究范畴中，该领域仍处于尚待深入勘探的阶段。本文聚焦于新华战争文学中女性人物的复杂面相，以性暴力受害者、母亲、敌方女性三类形象为主，综合文本细读和历史考证，关注女性主义观点的论辩，冀能细化推进新华战争文学女性人物的研究。

一、性暴力受害者

从人类的历史经验来看，女性作为相对弱勢的群体，在战争暴力中经常沦

¹⁷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页394-395。

¹⁸ 胡传荣《战争与和平：社会性别视角的剖析》，见《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3期，页49-50。

为牺牲品，世界文学史上对此有大宗的描述，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到中世纪的《尼伯龙根之歌》和《罗兰之歌》，从文艺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六世》和拉辛的戏剧《昂多马格》，到十九世纪后期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莫泊桑的《羊脂球》，再到二十世纪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这些文学经典对女性与战争的关系均有精彩动人的描绘。至于理论方面的战争研究，也有很多成果。

出生于新加坡的加拿大及英国籍政治学家，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奥卡纳干分校教授亚当·琼斯（Adam Jones，1963-）在其著作《大屠杀：全面介绍（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中谈到：纵观历史上的大屠杀，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女性在其中被杀害。……微观管理的性别战术极少被运用，在“战争退化”¹⁹的现代更是如此。女性被暴露在直接的虐待和暴行之中，已经成为了常态。……从言语攻击和羞辱，到人身攻击和单独强奸，再到多人强奸和轮奸（通常发生在长期性奴役的条件下），直至大规模的奸杀。史料也显示，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南京大屠杀为例，数万名女性，其中大部分在经历长时间的轮奸后被杀害。日本士兵回忆：“我们对女人如饥似渴！军官们下达了强硬的规则：如果你强奸了一个女人，事后就杀了她。”“也许当我们强奸（女性受害者）的时候，我们还把她视作女人，但当我们杀她的时候，只觉得她和猪没有两样。”目击的中国群众则描述，“街道上如此多的尸身，都是群奸和杀戮的受害者。她们被脱光了衣服，胸部被切去，留下一个可怖的黑棕色的洞；有些被刺中腹部，肠子拖在身旁；有些私处被塞入一卷纸，或一块木头。”几乎没有女性能够幸免于难，八岁的幼女，以及老妇人，都遭到奸杀。即使是没有立刻被杀害的，也因遭虐待后被置之不顾而于一两日后便身亡了。²⁰

在新华文学的战争书写中，作家们也如实地将战时女性性暴力受害者的身

¹⁹ 马丁·肖（Martin Shaw）在《战争与大屠杀：现代社会中的有组织杀戮（War and Genocide: Organized Killing in Modern Society）》中提出，大屠杀可被视作现代战争的一种特定形式，同时也是更为常见的“战争退化”形式的一种延伸。其涉及将对有组织的武装敌人的蓄意的、系统性的战争，扩展为对没有武装的人口众多的平民的战争。Martin Shaw, *War and Genocide: Organized Killing in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p.5.

²⁰ Adam Jones, *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329-330.

份记叙于各个文本。赵戎（1920-1987）的短篇小说《芭洋上》中的张大嫂，“昨夜被强奸得好凄惨，她搬来这里不过一年间，平时非常勤力开芭，畜牧，种植，一家人好好过日子。”²¹；苗秀（1920-1980）的短篇小说《红雾》中的跳舞女，“前晚不是给那些矮瓜轮流干了……”²²；同是苗秀的作品《太阳上升之前》中的妓女黑凤，被宪兵部命令“明天早上 9 点钟到大街的‘新时代旅馆’集中，让鬼子领去宪兵部那里报到，充当军妓”²³，继而踏上逃亡之路；郭宝崑（1939-2002）的戏剧《灵戏》中的医疗队“姑娘”，遭到小兵轮奸，却被参谋部的长官劝说撤销告诉，“把自己送上了一条生不得死不了的道路”²⁴。

不难观察到，无论是身边有幼儿的妇人，摩登的跳舞女，流落热带讨生活的妓女，又或在前线值班的护士，都成为了，或被视作了战争中性暴力的对象。如亚当·琼斯所描述的，战时女性被暴露在虐待与暴行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美国记者、作者、女性主义活动家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 1935-）则从性别的角度，更为尖锐地指明了这种现实：

男性对于发生在战争中的强奸的态度非常滑稽（funny）。毋庸置疑，就是该发生一些强奸。虽然不合理，但就是无可避免。当男人是男人的时候，他们互相厮杀，他们占领新地，他们征服新民，他们驶向胜利，毋庸置疑，就是该发生一些强奸。²⁵

其观点又延伸向了另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这种“就是该发生一些强奸（there shall be some raping）”的态度之下，战时女性一方面随机地、无差别地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还被迫成为长期被奴役的军妓。以《灵戏》中的姑娘为例，她在前线任军医护士期间遭到侵犯，后被送至营房“滋润士兵们的疲惫身躯”，在文本中，她同其他角色一样以幽灵的身份出现，讲述生前未尽的故事。当她与同班的护士遭到同战线士兵的轮奸，男性长官作出了如下的解释：

²¹ 赵戎《芭洋上》（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2006），页 23。

²² 苗秀《红雾》，收录于刘笔主编《苗秀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 167。

²³ 苗秀《太阳上升之前》，收录于刘笔主编《苗秀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 4。

²⁴ 郭宝崑《灵戏》，收录于柯思仁，潘正镭主编《郭宝崑全集·第三卷》（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页 199。

²⁵ Susan Brownmiller,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5), p.31.

你的遭遇我很同情，他们粗暴地侵犯你们的犯罪行为，尤其是侵犯的优势自己的姊妹同胞护士，那是无可否认的。你的痛苦愤恨我也可以充分理解。但是，如果能换个位置，掉过头来想一想，也许你的情绪就不同了。你想想：我们的士兵们，都和你一样，使我们这个优秀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都是为了祖国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我们领袖的荣誉和尊严，离开了和你一样值得留恋的温暖家乡和亲爱的家人，出国奋战。他们和你们不同的是，你们战斗在后方，我们战斗在前线；你们面对的是艰辛困苦。他们面对的是生死存亡。他们有的要抛下妻子儿女，有的还从来没有碰过一个女人。对于这些战士们，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它们的需要安慰、需要温存、需要在走向死亡之前得到一点女性的安慰、享受一点肉欲的快乐？和他们的死亡相比，你不觉得这种创伤、这种委屈是一件很轻微的事情吗？²⁶

这种将女性置于绝对从属地位，并弱化乃至消去男性犯罪感的理念，与二战时期日军的“慰安妇”制度不谋而合。事实上，早在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在大阪、京都就专门辟有游廊（妓院区），由幕府进行管理。游廊里的妓女、艺妓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性奴隶。这一政府通过政治权力对卖淫进行“公”的管理的制度被称为公娼制。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在海外殖民地的扩张，日本的娼妓业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扎根，之后在台湾、“满洲”、朝鲜半岛等地遍地开花。二战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盟军总部下达了关于废止日本公娼的备忘录，但公娼制并未真正被取缔。日本当局为了减少占领军强奸日本妇女案件的发生，依旧延续了公娼制的思维和做法，设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 RAA）这一场所，公开招募妇女对占领军从事性服务，并美其名曰此举是为了保障良家妇女的安全而设立的一道“防波堤”。因此，日本的公娼制实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力对女性个体的性侵害政策，而二战时期日军的“慰安妇”制度不过是性侵害政策在被侵略土地上的延续和扩展。²⁷

与《灵戏》中的姑娘所经历的一样，女性所经受的性暴力，即使是由明确的法律条例定性为犯罪的行为，却仍然在男性的主导之下一再地呈现出合理化、

²⁶ 《灵戏》，页199。

²⁷ 胡澎<性别视角下的“慰安妇”问题>，见《日本学刊》（第五期，2007），页119。

普遍化的样态。在姑娘打了报告之后，部队总司令作出了如此的回应：“照说强奸军团护士，按军法是要判处死刑的。可是眼下本岛保卫大战随时就要爆发，在这个时刻开庭杀人，肯定会扰乱我们的军心，降低我们的士气。不行！把案子压下去！”²⁸剧本中对于姑娘的经历有直接干预的男性角色展现出了一种高度一致的逻辑：总司令以不可扰乱军心为由，压下了案子；长官劝说姑娘用“纯洁的少女身心”去“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将军（总司令）面对姑娘死后的质问，仍表示“说实话，她们死了我也不在乎……我要他们在上战场之前把身心的苦闷全都发泄出来。我要叫他们高高兴兴、士气高昂地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地给我打胜仗！”²⁹正同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女性主义活动者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的论断所言，“她是依照男人来定义和区分的，而不是依照她自身，她是附属性的，相对于本质的非本质性。他是主体，他是绝对的，她是它者。”³⁰占据着绝对主体位置的男性，将“战争”、“军心”、“士气”定义为凌驾于女性之上的优先考量项。女性最基本的权益，哪怕受法律的制约，也同样会在这种附属关系中被轻而易举，乃至理所当然地忽视和侵犯。

从文本中亦可看出，对于女性的这套定义和区分是与战争中的“敌我”无关的。姑娘最开始的遭遇便是“在开战之前十天的夜里，我正值班……两个小兵走进医疗室，求我出去看看他们的几位同伴……万万没想到，那是一个陷阱，那是一个阴谋……”，后经过长官的“教育工作”，又被“送进了一个长期被铁丝网围住的营房。那里住的全部都是女人，任务就是滋润着士兵们的疲惫身躯，激励士兵们的战斗士气”³¹。在战争环境中，“杀戮”成为一种被允许的、英雄式的行为，取人性命和其余“不被允许”的暴力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加诸于女性的性暴力（强奸）就成为了战争的副产品。军队的男性特征：专属于他们的武器的野蛮力量，武装人员之间的精神纽带，下达和服从命令的男性纪律，等级统率的简单逻辑，更使得男性确认了长久以来的一种怀疑，即女性是无足轻重的，她们与世界的重要部分无关，对于事件发生的中心舞台而言，她

²⁸ 《灵戏》，页 198。

²⁹ 《灵戏》，页 206。

³⁰ 奈丽·费曼〈语言的策略：超越性别规范〉，见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编，陈引驰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页 55。

³¹ 《灵戏》，页 198-199。

们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³²因此在男性人物的话语表述及深层认知中，在战争期间对女性施行性暴力，非但没有其是犯罪行为的自觉，反而还会发出“和他们的死亡相比，你不觉得这种创伤、这种委屈是一件很轻微的事情吗？”³³，“如果战士们可以牺牲，为什么姑娘们不可以牺牲？”³⁴的质问。与此同时，女性在这种“被动”中的感受也是与之相呼应的：没有温暖、没有温存、没有性、没有爱，只有消耗、消耗、消耗！不是人的消耗……³⁵这一方面与姑娘在开头所叙述的“他和我从初中一就是同班同学，我知道他一直都喜欢我。”的“温暖”、“温存”形成对比，另一方面，也直观地呈现出女性的“无足轻重”：即便姑娘“加入军医护士队伍，不久也上了前线，辗转各个战区”，但在男性的定义中，她却是士兵需要“得到一点女性的安慰、享受一点肉欲的快乐”时可使用的工具，而与“男性的”军队无关。

白俄罗斯记者、散文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S.A.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 1948-）曾谈道，“除我之外，没有谁去问过我们的外婆、我们的妈妈。连那些上过前线的女人也都缄默不语，就算偶尔回忆，她们讲述的也不是女人的战争，而总是男人的战争。循规蹈矩，字斟句酌。只有在自己家里，或是在前线闺蜜的小圈子里涕泪横流之后，她们才开始讲述自己的战争，那些我完全陌生的经历。不仅是我，连所有人都是陌生的。”³⁶与阿列克谢耶维奇以访谈记录战时女性经历的形式不同，郭宝崑在《灵戏》中直接唤起幽灵，用死者的声音叙述的表现无疑是另辟蹊径。他对创作中与死魂灵的对话有着这样的阐述：

杨厝港的日本人公墓很安静，不过这种安静有别于日本人对于二战历史的缄静。一个国家制造了世界性灾难，三缄其口。死者是难以平静的。杨厝港就是这样启发了我开始跟幽灵对话。……逐渐地，他们的肤色和国籍模糊了……战争沦亡的幽灵们，他们都已经超越了战争所争夺的那些利益。因此，死魂灵是不会骗人的。这世界上死了的人总比活着

³² Susan Brownmiller,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5), p.32.

³³ 《灵戏》，页 199。

³⁴ 《灵戏》，页 206。

³⁵ 《灵戏》，页 200。

³⁶ 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战争中没有女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页 4。

的人为多。跟幽灵对话是必要的。³⁷

战时受性暴力侵害的女性，是“难以平静”的死者，也是在历史叙述中“缺席”和“失语”的“被遮蔽”的主体³⁸。幽灵的声音与生者的话语又是殊途同归的，姑娘的痛哭和控诉同其角色一般，并不限于一个具体的、特定的个体，而是为无法开口、未曾开口的失语者们道出仍需填补的历史空缺。在《灵戏》的叙述中，姑娘不再只是施暴者和目击者回忆里失声的受害者，而更是正视战时女性经历、探析性别与战争关系的必要对话对象。

二、母亲

新华文学中的战争书写涉及到的女性角色有多种类型，其中之一就是母亲的形象。在女性主义的论辩中，女性所特有的“母亲”这一身份，在对于女性与战争的关系考量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按照一贯的传统，女性是被排除在战争之外的，所谓“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几近被视作是专属于男性的事业：仗是男性打的，同僚和对手也都是其他男性，战争的目的和终局也由男性定义。在文化方面，传统的思维模式将性别角色作出了如此的划分：男性代表着战争及成为战士，女性则代表着和平及成为母亲。³⁹尽管从理论上而言，“母亲”是一个更为宏观、具备更复杂意义的身份，但在本文所探讨的文学范畴之中，仍是以具体的人物形象作为载体进行叙述。母亲作为文本中常见的形象，在新华战争文学中虽不少有，却大都只占小部分的篇幅，难有连贯的情节以塑造出相对完整的人物。这一方面是女性在战争中被边缘化的又一次印证，一方面也是笔者认为研究战时女性，必须对“母亲”予以关注的原因所在。“母亲”的战争经历是真实发生和存在的，这并不因历史叙述和文本书写的缺失而改变，那么她是如何在被排斥中应对战争？她是否是与“和平”划上等号的？本文择选苗秀的小说《忌日》为解析对象，旨从这篇新华文学中罕有的，全然以“母亲”为中心描写战争的作品之中，窥得一些“母亲”的话语残片。

³⁷ 郭宝崑<和幽灵说话>，收录于柯思仁总编辑，陈鸣鸾主编《郭宝崑全集·第六卷》（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7），页241-242。

³⁸ 胡澎<性别视角下的“慰安妇”问题>，见《日本学刊》（第五期，2007），页120。

³⁹ Lucinda J. Peach, *An Alternative to Pacifism? Feminism and Just-War Theory, Feminism and Peace* (Spring Vol.9, No.2, 1994.): p.152.

苗秀（1920-1980）原名卢绍权，祖籍广东三水，一九二零年出生于新加坡。根据其回忆文章中所提，有两个人可以说是苗秀的师傅。一个是对面一家电版所的学徒，让他能够有机会接触新文学作品；一个是在照相馆当学徒的郑照飞，在郑的指导下，苗秀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七日，以笔名“苍言”于《新国民日报》的星期日副刊《星期美点》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苦闷》。同年下半年，苗秀开始在《南洋商报》的副刊《晓风》与《狮声》发表作品，此后又于《晨星》、《文艺栏》、《大世界国货展览会特刊》等刊物陆续刊载文章。一九四一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星马等地都被日本军所占领。星马两地的人民在这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日子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这段日子里，苗秀与赵戎等人，曾有一段时间靠卖“架天柴”过活。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苗秀曾与赵戎、夏怀霜等人出版文艺杂志《南方文艺》。⁴⁰《忌日》作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小说以“老太”为主角，讲述了白发人先后与两个孩子生离死别的悲怆故事。老太经历日军闯入家中的强行抓走儿子，为解救狱中的儿子倾家荡产，儿子仍病死在监牢，“只还给她一具没灵魂的尸体”⁴¹的残酷变故后，战时参加地下工作、战后活跃于纪念会和大游行的的侄儿阿庆，本会在忌日陪伴老太，最后也远渡他乡，渺无音讯。在这第四年的忌辰，老太丧子之痛难愈，又无法再盼来侄儿，终于“履行在儿子忌辰那天绝食的宿志。”⁴²

在进入文本细读之前，有必要梳理关于“母亲”与战争的女性主义理论，为分析《忌日》提供一个框架。女性主义和平主义（feminist pacifism）围绕着将世界依照性别角色分为“母亲”和“儿子”的这一重点展开，并以历史女性主义所强调的男性，或是男性的力量与战争的存在之间的关联为根本出发点。该理论的主张建立在如下这些基本观点的基础之上：第一，其认为相较被“物理力量”统治的世界，女性主义是与之形成对比的“道德力量”；第二，其坚持由于女性具备生育功能，她们在人类社会中便拥有特殊角色，且应该被赋予相应的权力；第三，其指出，由于女性作为一种普遍的从属“阶级”（a universal subordinate “class”）存在，她们处于民族主义之外，与彼此之间的共同

⁴⁰ 陈世骏<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见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14-18。

⁴¹ 苗秀<忌日>，收录于刘笔主编《苗秀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229-230。

⁴² 《忌日》，页227。

点比与同民族或同阶级的男子之间的共同点要来得多。在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中，女性生育孩子的生理事实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但也有许多人将女性视作男性的母亲，并用“以战斗报国（served the state by fighting）”和“以生育报国（served it by producing）”加以区分。⁴³而在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的观点中，战争被视作是一种将性别固定在既定角色的叙事，但其也指出了这种叙事之中的矛盾之处：通常用以抑制非既定性别形象和战争叙事的正义战士（男性）和美丽心灵（女性）形象，实际上是无法掩盖其他形象存在的可能性的，而新的身份概念也会围绕着这些可能性而形成。以母亲和士兵这两种通常不会混为一谈的身份为例，一个好士兵就如同一位好母亲，他们都会尽力做好应做的事，都会为未尽所能之处感到愧疚，也都对伤病、健康和寻求保护表现出同样的关注。但尽管如此，男性和女性仍然被排除在彼此既定形象的话语之外。⁴⁴

《忌日》中的老太作为一位女性，亦是一位母亲，同战争之间呈现出一种错综的关系来。她与战争最为直接的联结，就是在其中成为了一名丧子的被害者。而她作为母亲的这一身份，则使得这种关联更为“私密、个人、难以分割”。如南非作家、反战活动家、女性主义学者奥丽芙·施莱纳（Olive Schreiner, 1855-1920）在《女性与劳动（Woman and Labour）》一书中所言：

“男性制造了用以互相毁灭的回旋镖、弓、剑或枪支，我们制造的则是这些施行毁灭或被毁灭的男性！”⁴⁵ 母亲对于孕育生命的特殊体验，让她们以亲身的痛楚认知到生命的可贵，因此也可以看到，在奋力拯救自己骨肉的过程中，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发自本能的、且不遗余力的。当儿子要被鬼子带走时，她“整个身体爬在儿子的魁梧的身躯上，像一片落叶，浑身抖擞，抖擞着”⁴⁶；试图把儿子从监牢里赎出来时，她“倾家荡产，卖掉了丈夫遗留下的芭跟磨地楼”⁴⁷。一个仅有着“细小发皱的脸孔”、“瘦削的肩膀”的老太，在母亲的身份中与鬼子对抗、周旋。但她仍然是被排除在战争之外，始终无法左右那些“施行毁

⁴³ Grayzel Susan, *Women's Identities at Wa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p.158.

⁴⁴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Cambridg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4), p.55-56.

⁴⁵ Olive Schreiner, *Woman and Labour* (London: Adelphi Terrace, 1911), p.169.

⁴⁶ 《忌日》，页 228。

⁴⁷ 《忌日》，页 229。

灭或被毁灭的男性”的：无法阻止鬼子渡边带走儿子，无法扭转儿子的死亡，也无法干涉侄儿阿庆的去留。在母性的双重内涵之中，“女性与生育能力及孩子的潜在关系”⁴⁸成为老太奋力保护儿子的动机：“保证女性的生育能力和所有女性都处于男性控制之下的体制”⁴⁹，则是她寸步难行的成因。在她试图达成某种协议的时候，即便“倾家荡产”、“还把惟一留下来的金耳环卖掉，换来一瓶‘维他命’”想给狱中的儿子治病，也只是正中这种“控制”的下怀，最终只能换回“一具没灵魂的尸体”。

《忌日》中呈现的老太与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所具备的能量是不容小觑的，它并未随着儿子的死亡一并消失，而是找到了转移的对象。在打倒东洋法西斯的第一个元旦，“胜利也给老太带来了喜悦，减轻失掉亲生儿子的痛苦回忆。那种崇高的母爱，现在却寄托在阿庆身上。”⁵⁰奥丽芙将这样专属于女性的情感归因于对于“生育”的体验或想象，当女性目睹在战争中死亡的男性，他不只是“男性”，更是“母亲的儿子”，“被带来这个世界的身躯”，继而想到“那许多个月因骨骼和肌肉在体内成形而疲惫疼痛，那许多个小时的剧痛和呼吸困难，许多张婴儿的嘴从女性的胸部汲取生命”⁵¹的过程。因此老太一方面为自己真正生育的儿子“抹着老泪”，一方面也为阿庆，这个非她亲生的年轻伙子牵肠挂肚。而这种对于“儿子”形象的投射并不是单单体现在老太身上，《忌日》中仅有的另一位女性角色，二房东太太，也是如此。文本通过她对老太的理解来表达这种共通的感情，在开头处写“二房东太太，在那儿听了一下，仿佛还要讲些什么话，可是未了，摆出一付似乎非常了解别人苦衷的神气，摇了摇一颗圆脑袋，咧着嘴巴，轻轻的嘘出口叹息”⁵²，直到结尾终于揭开这种“了解”并非“似乎”，而是存在着切实的缘由：“‘咱们明天再去东陵告发渡边那战争犯害死咱们孩子的罪状吧’……这可怜的胖女人的儿子也是让渡边那鬼害死的。”⁵³笔者认为，此处的“咱们孩子”已经不单是“老太的儿子”和“二房东太太的儿子”两个个体的合称，而是母亲之间相同意义的悲痛之体现，

⁴⁸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rton Paperback Edition, 1986), p.13.

⁴⁹ 同上。

⁵⁰ 《忌日》，页 231。

⁵¹ Olive Schreiner, *Woman and Labour* (London: Adelphi Terrace, 1911), p.170.

⁵² 《忌日》，页 225-226。

⁵³ 《忌日》，页 233。

是女性对于生命的价值和可贵性的深刻理解。“唯有能够想象得到母亲们那静默的痛楚，那数百万的母亲正为曾经是，和不再是她们的儿子秘密哭泣的人，才能领会战争的悲惨。”⁵⁴如果说开头处的描写仍留有存疑的空间，二房东太太如何了解这丧子的苦衷呢？那么最后写明的她的儿子也让渡边害死了的事实，便是对那声欲言又止的叹息最沉重也最有力的解答。

但必须指出的是，有着“崇高的母爱”的老太，并非全然代表了“安守和平”的“美丽心灵”形象。尽管她“先前一直巴望着东洋鬼子完蛋，希望早日打胜仗来和平”⁵⁵，但在丧子之后，相较对于和平的希冀，更为激烈的是她对于复仇的渴望：

不，这是叫渡边那鬼害的。老太，永远记着这血仇，一天不报，她死了眼睛也闭不上。

老太，瞪着血红的眼睛，蹲在那口棺木旁边，她的旁边是那个阿庆，这伙子的脸孔是阴沉的。

愤怒的火花燃烧着心头，盖过了失去儿子的悲哀。

.....

在这黑色的新年，儿子的忌辰的日子，这孤独的老女人准备这么坐着，为这悲痛的日子而绝食一天——自从儿子去世的那一个元旦日起，老太是这么下了一个决心的，直到为儿子复仇为止。⁵⁶

这种对于母亲愤怒情绪和复仇心态的书写，在战争语境下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关于母亲的讨论都倾向于回避女性的愤怒与侵略性，因为女性的思维方式也被视作反应女性刻板形象的要素，而男性才应该是具备侵略本能的一方。但事实上，女性的侵略性并不亚于男性。⁵⁷在丧子后强烈且持久的愤怒之中，老太并非只是沉默地悲伤，而是燃起了要“渡边死在自家眼前填她儿子的命”的复仇之

⁵⁴ Grayzel Susan, *Women's Identities at Wa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p.160.

⁵⁵ 《忌日》，页 233。

⁵⁶ 《忌日》，页 230。

⁵⁷ Linda J. Nicholson, *Feminism Postmoder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52-55.

火，并且在实现之前，誓以“绝食”行为表明这种决心。而在阿庆离去之后，她针对杀子仇人渡边的愤恨更是开始蔓延，领悟到“这世界到处还多着向渡边那样的恶魔”。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远离与历史无关的抽象，不经反思的庆祝，说教和教条化，……让‘男性的’士兵和‘女性的’母亲无处可归”⁵⁸，《忌日》中对老太（母亲）的愤怒之情、复仇之意、绝食行为一系列的正面描述，便是塑造了一个足以挑战“柔弱被动的和平制造者”⁵⁹定式的母亲形象。

三、敌方女性

战争中既有“敌”、“我”之分，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中固然也会有关于敌方的书写和呈现，值得注意的是，新华战争文学中，不乏以敌方女性为主角的小说。而这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应是该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的探讨对象。新加坡作家姚紫（1920-1982）笔下便有两个经典人物的身份均是敌方女性：《秀子姑娘》中被俘虏的日本姑娘秀子，以及《窝浪拉里》中荷兰殖民统治者中校军官的女儿兰娜。其中秀子与被侵略国家的军官“我”陷入了矛盾的情感，双方既因效忠于各自的阵营，必须对彼此带有戒备和猜疑，又因自身难以遏制的爱恋之情互相依偎却深感痛苦，最终在这种无可调和、难以解脱的激烈冲突中，秀子反复尖叫着“你，杀了我吧！”、“杀死我吧！”、“我死在你手里会幸福的！先生！”⁶⁰，在争夺间死在了“我”的枪口下。而《窝浪拉里》中从集中营逃出后，被在苏岛小乡村避难的“我”所救的兰娜，则有着扭曲多变的个性：一面是出身高贵的殖民统治者小姐，一面又能为一支唇膏出卖肉体；落魄时，她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得势时，她趾高气扬，得意忘形；失意时，她温柔顺眼，怯弱可怜；得意时，她凶狠无情，高傲可恶；落难时，她可以付出真情；胜利时，她却可以忘恩负义，恩将仇报。⁶¹英皇加冕纪念日时，她在特等观台对有救命之恩的“我”的反应是“我不认识你，走开，可厌的中国人！”，她“根本忘记了我！——一个日本时期的逃难者，卑微的‘窝浪拉里’”。⁶²

⁵⁸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Cambridg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4), p.56.

⁵⁹ Lucinda J. Peach, *An Alternative to Pacifism? Feminism and Just-War Theory, Feminism and Peace* (Spring Vol.9, No.2, 1994,): p.153.

⁶⁰ 姚紫〈秀子姑娘〉，见《华文文学》（第8期，1987），页22。

⁶¹ 苏菲《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页131。

⁶² 姚紫《窝浪拉里》（新加坡：天马图书出版公司，1965），页66。

这之中突显出了一个特殊的相似性：相较书写敌方男性人物时单一的、伴随着直接暴力行为的侵略者形象，作家在塑造敌方女性形象时，都选择了一种矛盾的形象，这类女性人物一方面是敌人，一方面又是“我”——一个被侵略方的男性，因其外貌特征而倾慕的对象，并且在“我”的眼中，这个女性即使来自侵略的一方，也仍然是战争中的弱势群体。战争书写中对于敌方女性这种规律性的呈现，指向了对于该人物形象一种具有一致性的观点：

战争是一场男性得以证明他们男子气概的戏剧，而男子气概则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女性在战争中或许能够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但在这场支配性的叙事中，她们不会是发起者，也不会是行凶者。⁶³

《秀子姑娘》中的秀子，“在这一批俘虏当中，除开广田少佐，要算她是第一重要的人物”，是一个掌握重要情报的敌方工作者，而“我”则将她形容为“那憔悴的美丽的面庞，像一只落水的狼狈的猫”⁶⁴这样弱女子的形象。《窝浪拉里》中，兰娜是荷兰人，是“这百年来掌握印尼土地的统治者的女儿”，一开始让“我”“有点惶惑”⁶⁵，但“我”随后仍关注到她女性的特征：“她睡得很熟，棕色的头发像微波般的流漾在席上；一双雪白的胳膊露出两三道青肿的鞭痕，肩头有一线已经凝黑的血纹，像被铁丝网划破的。那因睡着而松弛的沙笼，斜落在胸脯下，露出一半白脂般的乳部；一只小苍蝇歇在乳根的上端——那是一粒小黑痣！”，并且旋即“被她的美吸引了”⁶⁶。这种规律并不仅仅是一位作家的个例，南来作家丁倩的《一个日本女间谍》中，同样有着相似的写法：当“我”“从苏州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得到许多友人的斡旋，又回到上海来”⁶⁷后，误以为一个以前在法租界见过的女子是个“女间谍”，于是“我怕着这样一个女人……我总是认为做间谍的人，无论生得怎么美丽，这美丽也不过是蛇样美丽罢了——因为她是危险啊！”⁶⁸但即使保持着这样的态度，“我”仍然以一种并非敌对和提防的姿态关注着她，“我碰见不少次她是带着寂寞的情调

⁶³ Marguerite R. Waller, Jennifer Rycenga, *Frontline Feminisms: Women, War,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65.

⁶⁴ 《秀子姑娘》，页 4。

⁶⁵ 《窝浪拉里》，页 31。

⁶⁶ 《窝浪拉里》，页 35。

⁶⁷ 丁倩〈一个日本女间谍〉，见李选楼主编《一个日本女间谍：新马反法西斯小说选集（抗战时期）》（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20），页 21。

⁶⁸ 《一个日本女间谍》，页 24-25。

啊……假使我不是认为她是间谍的话，那么，她实在是一个值得怜惜和可爱的女人了。这并不是在她的美丽上说，而是我常常从她那种寂寞的情调上发觉来的”⁶⁹。

从表面来看，对于“敌方女性”这类人物的态度转移近乎不合情理：无论她是敌方工作者，统治者的女儿，又或“我”认为的“女间谍”，都是侵略方，然而受侵略者对于侵略者理应存在的防备和敌意却转化为一种男性对于女性的爱恋乃至保护。但一旦从另一方面观察，这就反映了美国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让·爱尔斯坦（Jean Bethke Elshtain, 1941-2013）在《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一书中所指出的问题：

男性惧怕女性的性别和生产能力。这反映在他们将这种恐惧投射到了社会形态上，通过制度及活动，包括政治和战争，来排斥女性以保护自身。……另一方面，他们在有意和无意间宣扬女性等是弱小柔软之观念，并将自己定义为“非女性的（not-woman）”，也就是不那么软弱、易受伤害的。⁷⁰

在这种“排斥”之下，敌方女性的力量确实被削弱了，她的国家意识所造成的“敌”，与个人情感相互冲撞，使其从一个侵略者，成为了男性联想下情绪的、主观性的、肉体的⁷¹女性形象。这在秀子身上就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当她初次接受“我”的审讯时，她的态度是强硬的，且“愈说愈有勇气”：“我是日本人！我不能出卖他们！我不能出卖祖国！先生，倘使你强迫我，请你给我死吧！”⁷²；当她因“我”救了她而动摇了意念时，她开始陷入痛苦：“先生，我再唤不起过去的仇恨的火了，你舍命救我了，却害了我了，你使我活着，活在矛盾的意念中……”⁷³；而当她发现“我”骗取了她的情报，她实在无法在这种憎和爱之中找出路，便哀求：“既不能替祖国杀死你，还是你杀死我吧！我死

⁶⁹ 《一个日本女间谍》，页 25。

⁷⁰ Jean Bethke Elshtain,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42-143.

⁷¹ 洪镰德〈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挑战与定位〉，见《台湾国际研究季刊》（第 7 卷第 2 期，2011），页 104。

⁷² 《秀子姑娘》，页 5。

⁷³ 《秀子姑娘》，页 10。

在你手里会幸福的！先生！”⁷⁴如此一来，战争中“敌我”之间的拼杀，转而成为了“男女”之间的博弈，而前提则是，在此“叙事”之中，女性是不具备“发起者”和“行凶者”之身份的。

须要指出的是，新华战争文学中的敌方女性绝非仅止于这一个面向，这其中所反映出的“排斥”恰恰展开了更多的角度：在这样的现实之中，将女性写入史册必然意味着在公众和政治活动之外还要包容个人的主体的体验。⁷⁵相较于对于敌方男性杀戮、强奸等暴力行为的记录，文本对于敌方女性在情感和观念等方面有着更为细致的描述。姚紫在《秀子姑娘》的后记中曾说道，“秀子姑娘是死了，但是秀子姑娘的问题并没有死！”⁷⁶秀子身上的矛盾和痛苦，承载着在“第二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刚刚过去，血渍未干，死骨未寒，而‘华尔街’的战争贩子又在吹动着死亡的号角了，又在制造着第三次人和人的大屠杀了”⁷⁷的时况中，对于战争与人性的思考和质问；以及眼见着“旧的历史的教训，是这样‘血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昏鬼守尸’，令人惊心动魄！新的历史的道路，却是毫不爽地展开在我们的面前。”⁷⁸所发的思虑和困惑。姚紫“在抗战的烟沙”中着手撰写《秀子姑娘》，“从复杂的真实的事物中借鉴”出人物、背景、情节，最终“流着泪来处理她”，“安排了秀子姑娘的死”。⁷⁹可见这一敌方女性的形象并不是扁平的、纯粹用以体现仇恨的“敌人”，而是个人情感、国家意识、利害观念、人类真理相互纠缠冲突的共存体。

且从家庭价值、不投降主义和自杀倾向三个方面，来解析秀子这一人物的复杂内涵。其分别对应了秀子投身战争的动机、被俘后的行为，以及最终的选择。秀子毕业于帝国职业学校电讯科，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后，现为二零五装甲联队司令部的电讯员，掌握着不可多得的情报资料。她切实地参与到侵略战争中，并且对于祖国是忠诚的，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也是热衷的。她甚至不顾自己也在轰炸范围内，坚持要“看看我们皇军的飞机！”：

⁷⁴ 《秀子姑娘》，页 22。

⁷⁵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见王政、张颖主编《男性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页 5。

⁷⁶ 《秀子姑娘》，页 23。

⁷⁷ 《秀子姑娘》，页 23。

⁷⁸ 姚紫<血的纪念碑>，见《杂文，这支部队：姚紫杂文集》（新加坡：陈龙玉，1987），页 68。

⁷⁹ 《秀子姑娘》，页 22-23。

她毫不理睬，只管扑掉自己身上的泥尘，挺挺胸脯，嘴里哼着“君之代”的日本国歌，两颗眼睛兴奋地望着天空，她的神气正如久离故乡的游子忽然逢到亲人，不顾一切地流露着心中的欣悦和激动的表情。⁸⁰

但这也是秀子与“我”，乃至秀子自身矛盾的来源。丹尼尔·马奎尔（Daniel C. Maguire, 1931-）曾指出，因环境不同，对于一个人来说道德的事物，对另一个人而言也许是非道德的。行为的道德品质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之间的关系。⁸¹在“我”看来理应是道德的侵略行为，以侵略者秀子的视角来看，则认为“我们没有侵略，就活不下去的——土地那么枯瘠，物产那么贫乏，我们如不向岛屿外去发展，列强会消灭我们，自然环境也会淘汰我们的。”⁸²而随着情节发展，秀子内心的冲突愈发激烈，当这种为侵略战争的辩护产生动摇时，对家庭至亲的顾虑就成为最不可撼动的根本原因：“泄露本皇军的消息背叛祖国的时候，我那年老的父母和幼小的可怜的弟妹们，都必定死在政府的处分下这种残酷的灾祸，我忍心牵累他们吗？”⁸³日本国际法专家大沼保昭如此阐述家庭价值与国家价值之间的关系：

对于保障家庭幸福的外廓，由企业以及对其提供保障的国家加以维系共同幻想根深蒂固。这种根深蒂固的幻想，潜在于每个人的意识的某一角落。在日常生活中，它充其量也就是孕育了家庭的幸福与企业的繁荣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尽管如此，在遇到战争那样的危机状况时，就会表现出“为了保护家庭而服从国家的命令拿起枪”的形式。⁸⁴

无论是直接的不愿牵累父母和弟妹，还是间接的对物产贫乏和列强侵略的忧虑，实际都指向“保护家庭”这一动机。姚紫没有“把她作为一个反面人物简单地加以丑化”，而是通过对其思想和情感的呈现，挖掘其动因和苦衷，是为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和探究。至于秀子被俘后的不投降主义和她重复表现出的自杀倾向，则又是对作为侵略方的日本人，及其背后的民族文化的一种投射：

⁸⁰ 《秀子姑娘》，页 8。

⁸¹ Daniel C. Maguire, *The Moral Choice* (New York: Doubleday, 1978), p.63.

⁸² 《秀子姑娘》，页 12。

⁸³ 《秀子姑娘》，页 14。

⁸⁴ 大沼保昭著，宋志勇译《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页 51。

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面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知本国，使其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或在他们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⁸⁵

不投降主义和自杀倾向之间显然是存在着关联的，在这种背景之下，“自杀”堪称为一种彻底的解决方法。秀子的父亲在她临出发时便告诉她，“万一遇到不幸，自杀吧！上可对天皇陛下，下可安慰父母兄弟，别拖累……”⁸⁶而秀子也有一个贯穿全文的愿望：“杀了我吧！”这成为她被俘状态下“最体面的办法”。美国人认为自杀“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但日本人是尊重自杀的，并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有意义的行为，而这正可以洗刷当了俘虏的污名，赢得身后好评。⁸⁷可见，在对于敌方女性书写的研究中，不仅是“类型的、规律的”方面需要进行整合与剖析，在“个人的、主体的”思想和行为中，亦可挖掘出深沉的意涵。在敌方女性这一形象上，“敌”、“我”双方的对立冲突所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乃至个体内在的具体矛盾得以被叙述，女性经验的显性化和多元化，也让“被遗漏或被忽略的”⁸⁸体验得以留下证据，继而从另一个角度接近战争体验，使新华文学对于战争课题的省思与叩问，呈现出更具洞见和多面化的姿态。

第三章 战争与民族认同

新华文学的战争书写也涉及民族认同的问题。民族认同不但在学术界有大宗的理论论述，而且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所以，下面的章节

⁸⁵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运，王智新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页27。

⁸⁶ 《秀子姑娘》，页10-11。

⁸⁷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页115。

⁸⁸ 陈雁《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页351。

介绍关于民族认同的理论论述和历史叙事，然后转入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讨论，希望形成文本、理论和历史的三边对话。

首先简介一下民族认同的理论论述。在政治理论家大卫·米勒（David Miller, 1946-）看来，民族认同以五个条件为基础形成：首先，民族的成员必须视其他成员为同胞，并且相信他们之间共有某种相关的特质，也即民族成员是相互承认且共享“愿意同在一起”信念（a shared wish to continue their life in common）的人。第二，民族认同也是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认同。历史连续性不仅指大家共同拥有的过去，也指向未来。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而其中通常包括了军队的胜利与败北。因为我们的祖先为了建设和保卫这个民族付出了血汗的代价，我们作为后人，便继承一种延续他们先业的任务，并与同辈、后人共享这种义务。第三，民族认同是一种能发生主动行为的认同。这种“能动性”表现于整个民族共同的决定、共同的行动以及共同的成就等。第四，民族认同要求一群人定居于某块固定的领土，也即要有自己的“家园”（homeland）。在这个条件上，民族才开始与国家发生联系汇合的情形，因为国家正是在特定领域上行使正当性权威的组织。第五，民族认同要求民族成员共享某种特质，而此特质最清楚的表现就是“公共的公众文化”（a common public culture）。我们不能把一个民族的成员看作像一艘救生艇上的乘客，只是碰巧被扔到一个地方，被迫分享共同命运的人，人们必须因他们共享的特质而具备归属感。⁸⁹民族学家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avid Stephen Smith, 1939-2016）则将民族认同定义为“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⁹⁰。民族认同的多种维度在新华战争文学的呈现中明显地指向了两个方向：中国认同和新加坡本土认同。这一方面应就作者和文本的具体情况解析，一方面也需以整体历史背景作为参照。

新华战争文学所关注的战场，不仅限于新加坡，也不始于新加坡，这些都是亚洲现代历史的真实存在。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后，中国的全面

⁸⁹ 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22-25. 部分译文参考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页 47-48。

⁹⁰ 史密斯（Smith, A.D.）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 18。

抗战爆发，身居新马的侨民，支持中国抗战救亡的大业。他们意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他们身在海外，却心系祖国，抗战救亡成了他们的共识。⁹¹新马华侨在物质上、精神上全力支持中国抗战。据《南洋商报》刊载的《抗战二周年与新加坡华侨》一文所述：“今日抗战必胜局面的形成，固然是由于祖国前线将士的浴血牺牲，然而海外侨胞两年来的踊跃捐输不断不歇，有助于祖国抗战实力的充实亦有极大的关系。……在一万五千万的华侨捐输总数中，新加坡华侨捐输约占一千六百万元，这是客观的数目，这是五十五万五千华侨精诚拥护抗战的一种表示。”事实上，他们不仅“有钱出钱”，捐助了大量款项，而且许多人还毅然回国，奔赴抗日前线，或直接参战，或救死扶伤，真正做到了“有力出力”。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南进，形势险恶，新加坡危在旦夕，文艺界的口号从“反侵略文学运动”变为“抗日卫马（新）”。新加坡沦陷后，对于国破家亡、民族沦丧的严酷现实，文学不能不作出敏感的反应，一切有血性的作家艺术家无一例外地认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文艺要发挥它最大的力量，成为打击侵略者，鼓舞民众的武器，运用作家的笔尖，负起抗日救亡的责任。⁹²根据如此的历史事实，本章在以中国认同和新加坡本土认同为大方向的基础上，择选含括书写中国国内战事、新加坡华侨救亡、华侨本土认同，以及战时南洋景观的文本，探勘新华战争文学中对于家国与认同的多方位思考。

一、中国认同

一个伟大的号召——抗日民族自由战争，把全华族人民都团结起来。四万万五千万人，为了换取明天的太阳，慷慨地许下一切，就连寄居海外的同胞，也无例外。看呵，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如今已非应景的口号，而是道德的天秤。⁹³

⁹¹ 李选楼《一个日本女间谍：新马反法西斯小说选集（抗战时期）》（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20），页3。

⁹² 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页39-41。

⁹³ 刘思《回顾》，见《南洋商报》（新加坡），1940年4月15日，页22。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400415-1.2.124.1>

霍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政治理论教授比库·派瑞克（Bhikhu Parekh, 1935-）曾指出，民族认同的其中一个维度与政治团体自身的假想方式有关。政治团体是高度复杂的实体，成千上万的成员从未见过面，但为了它，他或她需要交纳会费、上供，甚至去死。他们还包括不计其数的过去的和将来的世世代代，通过共同的利益和纽带与团体发生联系。因为政治团体跨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世世代代，并涉及从未见过面的无数人，它需要不平凡的假想行动。⁹⁴在抗日民族自由战争中，新加坡华侨对于这种联系的具体表现，便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支援。在新华战争文学的书写中，这样的人物亦比比皆是：岳野的剧本《风雨三条石》中的司机老温，“九年前受抗战号召，去祖国参加抗战运输工作，走过西南诸省”⁹⁵；流冰的剧本《云翳》中，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莉玲积极参与售票、卖花、月捐等募款活动，还教育父亲“这是救国的事情，爸爸，难道你情愿让国家亡掉吗？”⁹⁶；老蕾的小说《弃家者》中写道，“在南洋的华人，每个人都出了很多的钱寄回‘唐山’，给打日本的军队，有的还回去当兵，男的、女的都有！”老婆子的儿子林阿狗，“为了祖国需要你，你丢下了年老的亲娘，献身给祖国了”，“丢弃了美丽的马来亚，回祖国去赴汤蹈火”，“林阿狗爱他的母亲，但他更爱新生的祖国！”而他的钱匣里，还装着“一张‘八一三’献金奖状，二十一张月捐收据，还有六十张剪下的新闻纸——都是军委会报道每月对敌作战的次数，歼敌若干，俘虏若干，夺获枪炮……等的详细报告。”而年迈的、在遇到“我”之前还不知抗战、月捐等事的老婆子，听闻“每个‘唐人’都要出什么……什么捐的么”，便毅然下了“等等我的鸡养大了，我一定卖掉一个，去交什么捐……捐的！”⁹⁷之决心。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在谈论远距民族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时曾提到一种普遍的社会状态：人类感觉自己被生养他们的故土牢牢系在一块，还将在她的怀里——他们这样梦想——寿终正

⁹⁴ 比库·派瑞克<多元文化中社会民族身份的界定>，见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刘泓，黄海慧译《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页 92。

⁹⁵ 岳野<风雨三条石>，见赵戎、苗秀、钟祺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七集 剧本》（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页 68。

⁹⁶ 流冰<云翳>，见方修编《流冰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有限公司，1979），页 32。

⁹⁷ 老蕾<弃家者>，见《一个日本女间谍：新马反法西斯小说选集（抗战时期）》，页 152-162。

寝。⁹⁸在这一类的新华战争文学中，祖国、故土指向遥远的中国，华侨即使身在海外，也同样抱有“同在一起”之信念，为之奔走、牺牲，有“莉玲”在力所能及处宣传、筹款；有“老温”、“林阿狗”切实地回到祖国的土地去“赴汤蹈火”；亦有“老婆子”在一知半解中，以“唐人”的身份认同参与民族“共同的行动”。海外华侨正是在这种紧密的联系之下，去接近对于故国原乡的梦想和想象，这就是离散民族主义、远程民族主义的表现。

三十年代联邦方面最活跃的作者之一流冰在《和平还是战争》中痛切写道：

自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海内外的同胞，都和干柴着了烈火一样，四万万颗心脏都沸腾得像要爆炸了。是的！敌人侵略以来已经六年了！我们忍耐着！但是，眼见敌人一步步地向前，我们东北一千万人没有了家，不！全国的同胞在苦难中生活已经六年了！⁹⁹

根据本地学者方修的考证，流冰成长于星马地区，童年生活有一段长期间是在星马度过的，成年以后在中国各地求学，一九三二年间又重返南洋，就职于本地文教界。后又离开星马，游历上海、东京各地，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再度回到这个第二故乡。¹⁰⁰尽管流冰如此的“到处漂流”，他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则是一种坚定的、强烈的中国认同。小说《在血泊中微笑》刊登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的《晨星》，系流冰重返南洋之后发表的作品，其以上海为背景，叙写这座“孤岛”上，经营了二十多年纸烟店的王老爹在小店被炸毁后，又在逃难途中失去了儿子和媳妇，只留下八岁的孙儿。王老爹抱着势必要复仇的决心，每日对孙儿说“眼泪打不过敌人，你要记着，记着这一天……”，而当他终于找到机会，带着满腔愤恨回到成了废墟的小店，并发现街边载满军火的日军军用车时，他“忘记了一切，忘记了他的孙儿，他只把七十五岁的生命和这一车的军火平衡了一下”，便动手销毁了这“杀死他儿子、杀死他媳妇、杀死无数同胞的军火”¹⁰¹，含着胜利的微笑，视死如归，壮烈牺牲。身在南洋的流

⁹⁸ Benedict Anderso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8), p.59. 译文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页74。

⁹⁹ 流冰<和平还是战争>，见《流冰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有限公司，1979），页129。

¹⁰⁰ 《流冰作品选》，页1-2。

¹⁰¹ 流冰<在血泊中微笑>，见李选楼主编《一个日本女间谍：新马反法西斯小说选集（抗战时期）》（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20），页16-20。

冰对于故土的描写极为细致：

一重铁栅门，隔开了两个世界，这边，是法租界的辣斐德路，那是多么恬静的太平的马路啊！而在铁门的这一边，半年以前，这里是被称为中国地界中最繁华热闹的西门。六条马路在这里集合着，分向东西南北去，在这里有银行，有陈英烈士的纪念塔，有新生活的纪念碑，有无数的人们流连着。五路军车匆忙地把人们运出租界，或由租界运进来。然而现在呢？一切都变了！这繁华的一角，成了废墟，你能说这便是热闹的老西门吗？¹⁰²

.....

他默默地，经过了尚文路，经过了蓬莱路，到了小西门，在那往高昌庙的电车转角处，便是他的纸烟店，王老爹向着这堆颓垣残壁呆望着。

103

流冰透过王老爹的视线所记录的，不仅是一连串具体的地名、熟悉的动线，更是这片特定的地域，“一块被赋予家乡之名、承载复杂而丰富的故土之思的土地”¹⁰⁴。当这片土地历经“最残酷的屠杀”、“最凄惨的悲剧”，陷入“可怕的沉默”，面对着记忆中的家园和眼前的废墟，“装着可怜的媚态”的都市和实际上演着的“最凶残的疯狂的浩劫”，这种强烈的割裂使得王老爹的愤恨甚至已经蔓延到了自身，“恨他自己已经衰老了，不能加进游击队，他怪他的孙儿太小了，不能去杀敌人”¹⁰⁵。同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所言，在“被分隔的世界，善恶二元世界，静止不动的世界”中，“土著做的梦是肌肉的梦，战斗的梦，挑衅的梦”¹⁰⁶。王老爹在小说的最后，以视死如归的姿态烧了一车军火，一方面完成了对“杀人的东西！杀中国人的东西！”的报仇，一方面“救了几千百个同胞”，即使难逃被敌军杀害的结局，但他“没有痛苦，胜利地微笑着”¹⁰⁷。这同作者“中国必然地会得到最后的胜利”之信心，

¹⁰² 流冰《在血泊中微笑》，页 16-17。

¹⁰³ 流冰《在血泊中微笑》，页 18。

¹⁰⁴ 西蒙·沙玛著，胡淑陈，冯榭译《风景与记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页 15。

¹⁰⁵ 流冰《在血泊中微笑》，页 18。

¹⁰⁶ 弗朗兹·法农著，万冰译《全世界受苦的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页 16。

¹⁰⁷ 流冰《在血泊中微笑》，页 19。

要以“四万万人的热血”¹⁰⁸来换取和平之意识，亦是高度一致的。

流冰的中国认同、原乡追逐、离散民族主义，在其以南洋为背景创作的作品中同样有所体现。作于一九三八年底的独幕剧《云翳》中，旧铁店的书记黄启明本要向东家陈维全预支十块钱薪水，为病重的孩子看病，但在得知东家是要自己合作将碎铁卖给敌人，把制造枪炮的原料供给敌人时，便同妻子张淑清一起表明，宁可孩子病死，也决不能做此等勾当。在陈维全对他软硬皆施、威逼利诱的过程中，黄启明反复强调“敌人正在侵略我们的国土，惨杀我们的同胞”，“连外国人都把铁卖给他们，各地的外国工人，都不和他们搬运铁片，何况我们还是中国人呢？这种行为，头家，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汉奸行为。”¹⁰⁹之事实。安德森曾特别标注过黎萨（Rizal）的著名诗篇《最后的告别》中关于亲族关系的词汇：祖国（母国、父国），或是关于故乡的词汇（故乡，或土地与水，即印尼语的家乡群岛之意），并从这种描述政治爱的对象的方式当中去进行解读。黄启明的话语之间，亦不难找到相似的用语：“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都市”等，而这都意指人们与之有自然联系的事物。在安德森的解读中，所有“自然的”事物都与某些不容选择的东西相挂钩。也正因如此，民族的属性就被融入肤色、性别、出身和出生的时代等——所有那些无法选择——不得不这样的事物中。在这些“自然的连带关系”之中，人们感受到可以称之为“有机的共同体之美（the beauty of gemeinschaft）”，由于这种连带关系是不容选择的，它们因此就戴上了一种公正无私的光圈。¹¹⁰这种“无私的爱与团结”也正是黄启明愿意为之而做出牺牲的：

我不能用这种出卖民族的钱来养大我们的孩子，使他终身不清不白，淑清，我情愿让他死去，做一个堂堂的中华民族的孩子，不愿他活着做一个汉奸的子孙！再说，我不能因为要救活自己的孩子去帮助敌人杀死千千万万的同胞的孩子！……陈先生，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要让孩子做一个堂堂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我们的同胞是过着怎样的一种境遇。……我更加没有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中

¹⁰⁸ 流冰《和平还是战争》，页 130-131。

¹⁰⁹ 流冰《云翳》，页 37。

¹¹⁰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叻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页 137-138。

国人不但不能做汉奸，而且有铲除汉奸的责任！¹¹¹

中国及中华民族，是黄启明“归属感”的明确所在，在同胞遭受侵害时，他一则作为在同一个历史事件中的“同辈”，担起保卫民族的义务，二则也为“后人”，即自己的孩子，赋予了同样的责任，要他做一个“堂堂的中华民族的子孙”。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 1948-）认为战争中在双方阵营都会爆发的敌对情绪，“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产生的其中一个社会条件便是，由个人所组成的集团，其中的个人必须把自身理解为一个集团；就是说，他们必须通过情感、传统、亲属关系、风俗、居住类型、语言等等把自身连结在一起。¹¹²这种民族归属涉及的是同“源”的人，黄启明的“源”指向的是中华民族，是身为“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原则。千里之外的同胞、其自身、他应要做“堂堂的中华民族的子孙”的孩子，都一致地符合这种精神原则：对丰富的记忆遗产的共同拥有，以及当下的同意、想要生活在一起的愿望、继续发扬共有遗产的意愿。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以古老的斯巴达歌曲来明晰这种民族认同的建立：“我们现在是你们的过去；我们未来将是你们的现在。”¹¹³这种关于共同体的理想与价值的认知，有效地引发了情感，并激起了行动¹¹⁴，黄启明因陈维全出卖民族换取利益的行为“悲愤到不能自制”，自愿牺牲家庭，也不与其同流合污，且要“使到全体侨胞知道你（陈维全）是怎样的一个人”，尽铲除汉奸之责任。

方修在《流冰作品选》的前言里，特别提到流冰在《云翳》中对黄启明决定牺牲小我之前内心矛盾与痛苦的刻画，这段描写对于理解其民族认同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张（张淑清，黄启明的妻子） 什么？这时候他还把铁卖给敌人？

那你有没有答应他？

¹¹¹ 流冰《云翳》，页 40-41。

¹¹² 布鲁斯·林肯著，晏可佳译《死亡、战争与献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页 213-214。

¹¹³ 热拉尔·诺瓦里埃尔著，陈玉瑶译《国家、民族与移民：迈向权力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页 68。

¹¹⁴ 比库·派瑞克〈多元文化中社会民族身份的界定〉，见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刘泓，黄海慧译《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页 92。

黄 你想我能答应他吗？

张 不过，启明，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你再失业，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挨饿，可是，小孩子不能陪我们挨饿呀！（悲哀流泪坐到

沙发上）

黄 哼！他就看透了这一点，要我们跟他去干我们不愿干的事！

张 这种事，怎么能够干呢？不过（咽着泪），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呢？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黄 （低头徘徊着）……

（孩子的哭声，那声音是多么的微弱，可是又那么刺进他们夫妻的

心啊）¹¹⁵

在妻子还“带着病后的憔悴”，孩子又病得很重的情况之下，黄启明愤而辞职无疑是将自己的家庭推入绝境，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前文中曾提到，米勒认为“我们不能把一个民族的成员看作像一艘救生艇上的乘客，只是碰巧被扔到一个地方，被迫分享共同命运的人”，人与人的聚合，不能看成是这种偶然的巧合，也不仅仅是为了利益的交换，而是带有一种伦理的性质。黄启明牺牲小我之选择，便是米勒所强调的“伦理性（ethics）”的体现：人不计利害地扶助他人，并且愿意加强共同生活的关系纽带。¹¹⁶尤其是在民族认同的层面上，民族是为个人身份的强大来源，尽管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呈现一种没有定形的状态，但它能够切实地唤起强烈的、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忠诚，人们愿意为了自己的国家，在流冰的这两部作品中，无论是王老爹还是黄启明，都为了中国，而牺牲生命。人们也坚定地认为，他们必须捍卫他们的国家及祖先的领土，即保护社区的文化和土地的完整性，他们亦肩负着对同胞的特殊责任，无论是作为个人行动时，还是决定公共政策时，都以同胞为优先考量。¹¹⁷黄启明质问陈

¹¹⁵ 流冰《云翳》，页 39-40。

¹¹⁶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页 48。

¹¹⁷ 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68.

维全时所言“你却忍心帮助敌人去屠杀我们千百万家的同胞！你就不会为他们想想吗？敌人天天屠杀我们同胞，轰炸我们的都市，这些枪炮、炸弹、飞机，都是用这些铁制造的，你有没有想到？”¹¹⁸既反映其自身对所属群体的认同，同时也是对追求一己私利、枉顾同胞者的抨击。在《云翳》发表的同年三月，流冰曾撰文《抗战中的侨生态度问题》，明确表示“在过去几个月的工作看来，我们工作的发展是不十分平衡的。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得到全体华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并指责部分侨生“没有祖国观念”，“对于援助这次的抗战，非常冷淡”。¹¹⁹其当时对于侨生态度问题的探讨，意在从中找寻解决方法，继而有效地动员这部分力量，而将此类人物置于文本中观之，则又是从另一角度书写战争中的众生相，并更突出了以黄启明为缩影的侨生对于故土和同胞的殷切关怀。戏剧家舒繆（1914-1999）曾说“我们歌颂的是天地间浩然长存的民族正气”¹²⁰，而在与祖国相隔了茫茫山海的南洋，亦有同民族成员的忠诚与牺牲被叙写在案。

二、新加坡认同

上述体现中国认同的作品，在抗战的最初期尤为盛行，当时的小说作者很多同流冰一样，由中国南来，对于中国的变乱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经历，沦陷区人民不屈不挠坚守民族气节的斗争，成为了最有典型意义的题材，得到许多作者的及时反映。同时，这些作者也直接取材本地救亡动态，创作了一系列有关本地救亡运动的作品。¹²¹而讨论新华战争文学中的新加坡认同，则需注意接下来一个关键的节点：日寇入侵新加坡。随着新加坡的沦陷，华人效忠本地的意识，自此播下了种苗。日军南进马来亚的第三天，即炸沉了“不沉之舰”威尔斯太子号，当然也炸沉了新马子民对英国的信心；接着南下狮岛才仅仅两周，“攻不陷的要塞”——新加坡高举白旗，“参与战斗会议的所有人员都认为反击毫无成功的可能”¹²²，一纸降书，十万英、澳、印联军将马来亚人民，交于

¹¹⁸ 流冰《云翳》，页38。

¹¹⁹ 流冰《抗战中的侨生态度问题》，见《流冰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有限公司，1979），页151-152。

¹²⁰ 转引自傅葆石著，张霖译《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页112。

¹²¹ 《马华新文学简史》，页172-175。

¹²² Mark Stille,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2, The Fall of Britain's Empire in the East* (Oxford: Osprey

三万日军的手中。至此，英国人在人们心中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复存在，而此后三年八个月的惨痛非人日子里，同生死、共患难的是马来亚土地上的众子民；在血泪交织的黑色岁月中，不分彼此、休戚与共的是巫、华、印族人；在紧急危难时，伸出援手的，不是高贵的英国殖民者，不是千万里外的亲人，而是同在这个苦难南国的泣血落泪人。于是，对这块以衣以食的土地，对这些同舟共济的异族伙伴，一种微妙的认同意识，便悄悄地在心底撒下了种籽。¹²³苗秀的许多小说就被置于这一新加坡历史上最悲壮的时代背景之中，其作品中不仅描绘热带城市的风土习俗，也以生活期间的新加坡人的历史命运和心灵世界，构成了新加坡华文小说的特殊色、味¹²⁴，亦体现出本地华人在苦难之中对共属群体产生认同之历程。

关于认同和归属感的变化与迁移，在学术界已有充分的研讨。英国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指出，认同这一概念并不具备能够在历史的沧海桑田间自始至终不产生变化的稳定核心，也无法将隐藏在表面差异之下的文化归属感稳定、修复或保证维持在一种不变的状态。认同从来不是统一的，而是愈来愈分散和断裂，它也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建构在截然不同的、纵横交错的、充满对抗性的话语、实践和立场之上。其受到激进的历史化的影响，长期处于变化和转型的过程之中。¹²⁵这种变化在日军入侵，新加坡沦陷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就更为突出，且能观察到明显的对照。在苗秀的小说《红雾》中，认同的转型发生在区老叔和儿子黑三两代人之间。区老叔本认为“在红毛统治时期，喊抗日，干干救亡工作，还没什么”，但“东洋鬼子进来了”之后，他的态度便是“你们这些毛头小子要跟东洋鬼子作对，真是寿星公上吊嫌命长。并且，我们是华侨，辛辛苦苦的渡洋过海来这番邦，还不是为的赚钱，这地头谁当主人翁关我们屁事！”¹²⁶可见其是将“本地”视作“他地”，与此地的联系仅限于来这里赚钱讨生活，与之并无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结，

Publishing, 2016), p.88.

¹²³ 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页16。

¹²⁴ 《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页124-125。

¹²⁵ Stuart Hall, "Who Needs 'Identity'?" 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3-4.

¹²⁶ 苗秀<红雾>，见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162-164。

更不与本地群体共享信念与责任。他对这异乡遭受入侵抱持旁观的态度，并激烈地反对儿子参与救亡运动，对于本地群体认同感的缺失，自然地使得他将私人的利益置于群体的义务感之前，儿子抗日的行动在他看来并非是报国的义举，而是“嫌命长”的“弥天大祸”。但黑三则全然不同，他积极参与各项救亡工作，“常常在会场上，空草坪上，对着黑压压的脑袋的波浪，哗啦哗啦地演讲”¹²⁷，更投身实际的战斗，搬走枪械、子弹，“跟鬼子驳火一直到天亮”¹²⁸。他的同伴阿喜被捕后，“给打歪了嘴巴虽然淌着血水，嘴角儿还吊着一个破碎的冷笑”¹²⁹。在描写黑三与阿喜奋勇救国行动的同时，文本中所反映的群众的漠视态度也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杀头示众的场面：

鬼子来了以后，这些日子，杀头这样的事情，像是家常便饭那样，前几天七支碑军路才砍掉两个，砍下的两颗脑袋吊在路边茶李树上，示众三天。区老叔赶到那里，挤进瞧热闹的人丛。嘿，好不怕人！吊在枝丫的两颗脑袋，圆碌碌地，浮肿着，都咧出一排门牙，还滴着血水。¹³⁰

还是日军抓人的现场：

四个鬼子亮着刺刀簇拥着两个被反捆了胳膊的犯人走进芭场来，后头还跟了一些暗牌马打什么的，凶神恶煞地。这是押送凡人，并不是拉伏，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好些人于是挤出羔呖店瞧热闹去，区老叔也随着站在门槛边，伸长脖子探视着。¹³¹

都可见为数不少的“瞧热闹”的群众，更有甚者认为“这些被砍头的都是罪有应得”、“我们华侨漂洋过海无非为的是赚钱”。王赓武教授在《家园何处是》一书中对类似的场面有这样的一段记录：

那天我跟着一些人走到小公园，公园在往河边的路上，离以前的学校不远。我不知道公园为什么聚起人山人海，以为有运动或表演可看，接着我们被告知将在这里目睹公开处刑。我们远远看见有个年轻华人男

¹²⁷ 苗秀《红雾》，页 162。

¹²⁸ 苗秀《红雾》，页 169。

¹²⁹ 苗秀《红雾》，页 169。

¹³⁰ 苗秀《红雾》，页 161-162。

¹³¹ 苗秀《红雾》，页 169。

子被带到公园中间，被迫跪地。我对即将发生的事依旧一无所知。忽然间，日本军官举刀砍下男人的头。军官第一刀未竟全功，只得挥下第二刀，才让人头滚落地上。群众惊叫出声，接着一片沉默。……这让我体会到人们只须片刻就能对残忍之举麻木无感。¹³²

文本的叙述与真实的回忆，都尖锐地指明这“人山人海”地“瞧热闹”的行为绝非个例。“漂洋过海”所指向的原乡与现地，战争背景下麻木旁观的群众与奋不顾身的斗士，均构成一种充满对抗性的画面。霍尔将认同视作是关于在“成为”的过程中，而非“已经是”的状态下，运用历史、语言和文化资源的问题：不是关于“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里来”，而是关于“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我们是如何被表征的，以及我们可以如何表征自己。因此认同是从内部构成的，而非是一种外部的表现。它与传统本身相关，亦与传统的发明相关，它强制我们用“持续变化的同一物”来阅读认同，而非一种无尽的反复；它不是所谓的回溯根源，而是与我们“路径”达成一致。¹³³在《红雾》中，可见的更多是不同人物在“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与“我们可能成为什么”之间的摸索与冲突，这一方面是每一个个体认同之间的差异，一方面也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所共同经历的阶段。同是苗秀所著的小说《火浪》中亦有人物在认同上的变化，例如一开始想着“能够搭这么一条船回祖国那多么好”的夏财副，“老都给一股青春的爱祖国的热情激动着。老想献身中国的抗战”¹³⁴。在亲历伙伴阿庄的牺牲，并听到他留下“打倒……日本法西斯……”的遗言后，夏财副“有生以来第一回觉得他是多么爱这受难的土地——这孕育他的土地！他年青的心，因为这土地的受难，给敌人蹂躏而剧烈地痛苦着”¹³⁵。在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的关键转折过程中，夏财副的认同从指向中国的“祖国”，转而投向了“这孕育他的土地”。苗秀曾在《写在〈火浪〉前面》一文中谈到，“我的本意是表现一九四一年前后那个如火如荼的大时代，和生存在那个时代里的一些男男女女的动态……这些人物，不管是进步的，落后的，正义的，反动的，勇敢的，懦弱的，他们都是处在‘时代’的支配下，他们的一举一动，也不能

¹³² 王赓武著，林纹沛译《家园何处是》（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页62。

¹³³ Stuart Hall, “Who Needs ‘Identity’?” 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4.

¹³⁴ 苗秀《火浪》（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页14。

¹³⁵ 苗秀《火浪》，页204。

超越那‘时代’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火浪》这小说真正的主角，是这个无时无地不出现的‘时代’。”¹³⁶不难观察到，其所塑造的每一个人物的选择与做法，也都以纵横交错的复杂姿态，成为了这个族群的认同随着巨大的历史震荡而建构、变化、转型的真实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苗秀在表现人物动态的同时，也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战时新加坡的景象，呈现出这片土地从蓝天碧波、欢笑阵阵的岛屿，到沙尘飞扬、民不聊生的废墟之转变。这种对于地理景观的描写并非个例，赵戎在小说《芭洋上》中，亦以浓重的笔触记述了南洋热带雨林的风貌。将此类极富地域特色的书写同其出现的时期结合观之，便已经可以勘察到认同主题的流变。《火浪》初稿写于一九五零年，于一九五九年重改；《芭洋上》写于一九五一年，于一九五八年由青年书局出版繁体字本。以一九四八年初发生的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的论争为背景，赵戎在一九六零年写成的《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一文中明确指出：

所谓侨民文艺亦即移民文艺，它是随着华侨移殖南洋而生下根的，当时华人只以寄居的姿态生活在南洋，则文艺活动自然亦只限于侨民文艺底性质了。历史是发展的，时间是向前的，百多年来华人在各地区中辛勤垦殖，繁荣南洋，也从此深深地热爱这土地，意识上已有作为永久家乡的念头，也就是说华侨已经不能和当地分开，要永远做当地人民了。当然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有其根据的，就是由物质生活的经济基础而造成的，决定的。试看华人的生活习惯在某些地区完全和土人一样，与或多或少的改变，都可看出华人是诚心做个当地人民的，那么，华人既早已要做当地人，则文艺自不能永远成为侨民文艺也很显而易见的了。要不然这侨民文艺和我们要做当地人的思维与生活，就完全矛盾，不能统一了。¹³⁷

在马来亚的土地上共同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残暴统治的南洋华人，在战争的阴影下，同当地各民族一道产生了对于“要生活要自由”的一致目标，并具体地体现为争取公民权等实际要求。这意味着华人从“侨居”的过客，成为了“生

¹³⁶ 苗秀《写在〈火浪〉前面》，见《火浪》，页4。

¹³⁷ 赵戎《赵戎文艺论文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0），页30-31。

根”的本地人。随着这样的转变，作为中国文艺支流的侨民文艺完成其历史任务，文艺界转而关注本地现实，强调在作品中反映本地生活形态，刻画地方特色。《火浪》与《芭洋上》作为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本，亦从人物取名、方言运用、景观书写等方面着手，在创造新的艺术风格上进行了成功的历史实践。迈克·克朗（Mike Crang）认为，地理景观的含义是无法用数据来表达的，由数据描绘出的地理缺少了由人亲身感受的丰富内涵。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尽管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但不能被视作是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而是通过其“主观性”言及了地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¹³⁸本文梳理上述两部小说中的相关内容，着重探讨新华战争文学中战时景观的书写与意义，理解其在这一特定时期内含有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¹³⁹。

苗秀最初通过郭沫若的《幼年时代》接触到五四新文艺作品，他将之称为其“通向中国现代新文学的一道桥梁”，并自此以文学作为精神上的寄托，心灵上的慰藉。不久后随着居处的迁移，便每日到隔壁的会馆阅读本地出版的大小日报，并从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民国日报的《公共园地》，总汇报的《曝谷场》等文艺副刊，开启了与马华文艺的联系。¹⁴⁰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苗秀任《星洲日报》副刊主编期间，将《火浪》的大部分篇章分成几个独立的故事发表在《晨星》，后于一九六零年成书出版。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其所亲历过的战火炮轰下的新加坡，被誉为“一部史诗般的小说”，呈现了“一副充满血腥的战乱画卷”¹⁴¹。且看一组日军轰炸开始之前与之后的景观对比：

轰炸开始之前	轰炸开始之后
温暖的浪潮，一排跟着一排，轻轻拍打着这巴施班让西海岸的细软沙滩。在耀眼的太阳光底下，那喷起来的白	在马来半岛的极北，透明的蓝空，正密布了浓烈的硝烟，火和钢铁，互相碰击着，撕裂着空间。 ¹⁴³

¹³⁸ 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敏慧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 55-56。

¹³⁹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28-135.

¹⁴⁰ 苗秀<文学创作第一课>，见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 107-109。

¹⁴¹ 王东妹<一副战乱时代的生动画卷——论苗秀长篇小说《火浪》>，见符和水，李选楼编《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4），页 125。

¹⁴³ 《火浪》，页 106。

<p>色的水沫，老像一阵阵的嬉笑。 澄蓝的天。海也是蓝澄的。隔海的小 岛，突出在碧树丛的那些圆圆的煤油 缸，在阳光底下闪烁着银光。¹⁴²</p>	<p>整个海港震栗了，市街在冒着浓烟， 土库街，打铁街，椰脚街这一带市中 心区都叫鬼子机炸得一塌糊涂，鲜血 溅满了柏油路，血腥味混合了烟硝， 教人感到窒息。¹⁴⁴</p>
---	--

波科克（Douglas C.D. Pocock）对于文学作品中的地区经历有如此的描述：小说的真实是一种超越简单事实的真实，这种真实可能比切身的、日常的真实体现或包含了更多的真实。¹⁴⁵苗秀对于景物的记叙，在小说整体的编排中，除了体现战争所带来的客观上的死亡与毁坏之外，同时也反映了身处这片土地的族群的生存状态。第二章开头所描写的天蓝海澄，人们“谈天说地，嘻哈大笑”，一派祥和的岛屿，事实上在小说第一句就透出了不平静的端倪：这热带的大城整个浴在火样的热浪里，在喘息着。热带城市阳光、海浪、椰树的典型景观之中，包裹着复杂的社会样貌。殖民地政府无力保卫这个小岛，而在地的人们又都来自不同背景，有着相异的思想与目标：从那远迢迢的欧罗巴而来的白种人——这些上帝的天之骄子，把这儿当作冒险家的乐园。一些汪洋大盗，革命志士，在亡命的时候又把这里当作逋逃藪。但是最可悯的那是些来自中国的黄帝子孙，他们是被天灾人祸迫得走投无路，才啃着牙龈，不得已离乡背井，远涉重洋。……而最大的愿望，也不过巴望能够积下几个血汗钱，以便年老的时候还乡罢了。¹⁴⁶但在这个曾经的“栖身地”被战火席卷，一切的景观都面目全非之后，关于“还乡”的古老愿望，被眼前“保乡卫乡”的迫切需求所替代，“乡”所代表的地方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从战争这样“不可避免的对抗之中求得一种平静与安全的状态”¹⁴⁷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致的目标，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和权利。

¹⁴² 《火浪》，页 11。

¹⁴⁴ 《火浪》，页 127。

¹⁴⁵ Douglas C.D. Pocock, “Imagin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Geographer” in Douglas C.D. Pocock,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 Essays on the Experience of Place*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11.

¹⁴⁶ 《火浪》，页 1。

¹⁴⁷ 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 11-12。

耶鲁大学教授伦纳德·杜布（Leonard Doob，1909-2000）对《南提洛尔年间 1953》中给出的德语单词“*Heimat*（故乡）”的意思进行了如下的翻译：

故乡是风景。故乡是我们已经体验过的风景。这意味着它曾经被人争抢过，曾经收到过威胁，并与家族的历史、城镇的历史和村庄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我们的故乡是骑士和英雄的故乡，是战斗和胜利的故乡，是传说故事和童话故事故乡。但是，不仅如此，由于祖先挥洒的汗水，我们的故乡成为富饶的土地。我们的祖先为了这个故乡战斗受苦，我们的父辈为了这个故乡而死。¹⁴⁸

苗秀在小说开头便已阐明，这个白种人统治着的殖民地都市，是由那些来自中国，来自印度，来自亚非利加的黄色，棕色，黑色皮肤的估俚，苦力，用他们粗糙的手，用他们的生命，鲜血和汗水，跟无垠的原始密林，跟热瘴，黑死病，大伯公（老虎），象群，毒蚊，进行搏斗，开拓，建立起来的。¹⁴⁹可以说，早在“还乡”的愿望尚存之时，人们就已经与这片土地产生了强烈的情感联系。而战争作为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则激发了这种联系的具象化体现，也成为南洋这片土地从“栖息地”转而被视作“故乡”的关键转折点。小说中梅挺秀的一番言论便清晰地表达出了这种转变：“是的，我从前也这么想：我是中国人，马来亚不管怎么好也是番邦，人家的土地。中国——我的祖国，这才是我情感事业的寄托！我迟早要回到她的怀抱里的……可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看看这些中国人吧，他们的身家性命都在这里了，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在这土地生了根，谁也赶不走他们。但是现在东洋鬼子来了，他们的亲人给鬼子的炸弹炸死了，他们辛辛苦苦种起来的树胶园给烧掉了，他们的住屋给炸坏了。我问问你，这些人不应该起来保卫他们的财产，保卫这土地吗？”¹⁵⁰段义孚（1930-2022）曾指出，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将亲切经验表现出来，这里所说的亲切经验包括了地方经验。那些规模庞大的风景区脱离了文学的帮助，也已经足够打响自身的知名度，但文学艺术能够引起对诸如一座小镇、

¹⁴⁸ 转引自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页 128。

¹⁴⁹ 《火浪》，页 1。

¹⁵⁰ 《火浪》，页 139。

一处街区、一道山谷这样的经验领域的关注。¹⁵¹《火浪》中对于战时景观的书写亦是如此，房屋因轰炸而毁坏、倾塌、化作“一片瓦砾场”的背后，是“压在烂砖破瓦底下的一百多个住民”，是一家子十几口人“通通给埋在里面”¹⁵²这样直观而残酷的战争经验。曾经在农历新年时贴上春联的家家户户，地上铺满放爆竹后的落红的大街小巷，门前挤满人买票的大小电影戏院，并非新加坡的代表性景观，但却实实在在地蕴含了深厚的在地经验，同在这里居住、生活的群体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而战争让“这一切都变了，吓人的炮声，机关枪声，代替了爆竹”，“街道全都荒凉了，马路上很难得碰到人”¹⁵³。文本中对于过去景观的回忆和与当下景观的对比，包含的不只是对城市景观的纯粹感受（perception），更是通过联想之网而出现的对城市的复杂观念（conception）：对于城市“垂死的状态”的目击；人们对于“让这地狱般的苦难日子”早些结束的“简单的企求”；“疑惧的目光，焦虑的面庞”；“倒退了五百年”，充斥着“黑暗，恐怖，奸淫，虐杀，流血，死亡”的历史。于是城市就不只是一个物理结构，它更像是一种心态，一组态度，一个人类联系的网络，一套习俗和传统。¹⁵⁴而《火浪》则通过捕捉街巷、店铺、破旧楼房的碎片，反映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命运的跌宕、态度的冲突、认同的转变，书写了战时新加坡特殊的地方经验。

相较《火浪》中记叙的城市景观，赵戎的小说《芭洋上》则更集中于对南洋热带雨林风貌的描写。作为最富有南洋地域特色的小说类型，“热带风情小说”系推进新华小说本地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类别，创作于一九五一年的《芭洋上》是该类型小说的早期尝试，但其将热带雨林的风土人情融入小说之写法，已相当成熟，可谓兼具开拓与奠基之意义。当风景与民族、本土、自然相联系，这个词也具有了“隐喻的、意识形态的效力”，这种效力是由于“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或性格与其栖居地区的本质或性格之间，发展出了一种更恒久的联

¹⁵¹ 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页134。

¹⁵² 《火浪》，页109-110。

¹⁵³ 《火浪》，页222。

¹⁵⁴ 张英进著，秦彦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页3-4。

系”。¹⁵⁵ 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 1798-1855）的最后一部长诗《塔杜施先生》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说明了波兰人民为争取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构成其壮阔的历史背景的同时，亦将故乡的景观描写得灿烂辉煌，以“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的气派展示出立陶宛大自然的风光：此刻请你把我渴慕故园的灵魂/带到那些小丘、森林，如茵的牧场，/那儿蔚蓝色的河水静静地流淌，/辽阔的大地延伸到涅曼河滨；/带到那广袤的田野，那儿美如仙境，/小麦一片金黄，稞麦银波粼粼；/白芥似琥珀，荞麦像雪一样亮晶晶，/那闪耀着处女羞红的是紫云英，/环绕着的田塍绿油油，像丝带一样，/丝带之上还有静静的梨树成行。¹⁵⁶ 易丽君将这样的书写称之为“诗人对祖国炽烈的爱、希望和渴念；是诗人奏起的这波兰民族的最强音世代代在人间回荡。”¹⁵⁷ 密茨凯维奇笔下的森林，同“这时他们听见号角的呜咽和犬吠声，/他们猜到那是打猎的在向他们靠近，/他们在浓密的树枝间胆战心惊，/便突然隐去，又如森林之神。”¹⁵⁸ 的捕猎场景紧密关联，这是他对于“波兰最后一代贵族”的描绘。而赵戎在南洋书写的森林，则在相似的大树、深山、蔓藤景观中，呈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热带风貌来。在《芭洋上》中，人与森林的联系并非狩猎的场合，而是开荒的劳作：

有些已被火烧过了的那坚实而长大的树干，变成了一条黑色的长炭；有的还在硬挺挺的直立着，危危欲坠的快要倒下来。那些尚未烧透的深深盘在地下的树头，仍在冒出袅袅的浓烟来，还会不时逼逼卜卜的爆裂着，生起火光。……被火烧过的地面，泥土变成了紫褐色，分外的肥沃和松脆，用不着怎样去锄掘、翻地、下肥、只消下种的工夫便够了。

159

森林环境的一个特点就是自成一体，在里面无法分清天地，看不到日出，也没有地标，¹⁶⁰ 尤其在热带，季节变化也是微不足道的。在如此令人望而生畏的环

¹⁵⁵ 达比著，张箭飞，赵红英译《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页 85。

¹⁵⁶ 密茨凯维奇著，易丽君，林洪亮译《塔杜施先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页 2。

¹⁵⁷ 易丽君<前言>，见《塔杜施先生》，页 7。

¹⁵⁸ 《塔杜施先生》，页 121。

¹⁵⁹ 《芭洋上》，页 14。

¹⁶⁰ 段义孚<森林环境>，见段义孚著，志丞，刘苏译《恋地情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境中，前人们“用了生命、血汗和时间”，从原始的山野中开辟了居住和行走之地。文中的三个行脚人在途中遇到的老人家，青年时代便出洋，“像一株适宜热带的植物，扎实地生下根来”，“锡矿工、割胶工、咕哩、打杂，什么都做过了”¹⁶¹。赵戎认为“一篇有价值的作品是能够反映此地的现实的”，那些“随便改了一下地名和人名，放在什么地方都行”的作品不具备真实性。¹⁶²《芭洋上》则准确地掌握了本地社会所提供的真实题材，继而刻画出了一个专属于南洋的森林：不是塞南古（Étienne Pivert de Senancour, 1770-1846）所倾心的“沉默的荒地”¹⁶³，亦非密茨凯维奇用绚丽迷人的光线编织出的神秘无垠之地，而是南洋客抱着一腔热情“指望从此捞起”的逐梦之地；是“残暴的日寇又打了进来，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以后，这罪恶的日子，更加难找生活了”现实下的梦碎之地；是开芭人开垦、种植的劳作之地。美国学者米切尔（W.J.T. Mitchell, 1942-）曾指出，风景是人与自然，自我和他者之间交换的媒介。¹⁶⁴《芭洋上》中的南洋景观，立足于行脚人、南洋客、开芭人的地方经验之间，一草一木都有血汗的浇灌，正是一种不可复制、难以篡改的真实。

正同英国艺术历史学家克拉克（Kenneth Clark, 1903-1983）所言，我们被树木、花朵、草地、河流、山丘、云朵，这些并非由我们制造，而又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命和结构的事物包围着。长久以来，它们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和敬畏心。我们在想象中重新创建了它们，用以反映我们的情绪。¹⁶⁵在“国仇、家恨”、“这些血债，还能忘记吗？”¹⁶⁶的强烈恨意之中，景观也被注入了战争的沉重和血腥：

……只看见远远亚答屋里，油灯一闪一闪的摇晃着，像鬼火！那挣扎着的摆动的人影，混乱在一起了，分不清谁个来。

从屋里发出的恐怖声，渐渐的啞哑下去了，低沉得似乎听见了喘息！

页 115-116。

¹⁶¹ 《芭洋上》，页 10-11。

¹⁶² 《赵戎文艺论文集》，页 38-39。

¹⁶³ 沙玛著，胡淑陈，冯樾译《风景与记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页 643-644。

¹⁶⁴ W.J.T. 米切尔〈帝国的风景〉，见米切尔编，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页 5。

¹⁶⁵ Kenneth Clark, *Landscape Into Art*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 pg.1.

¹⁶⁶ 《芭洋上》，页 13。

大气，浓密得越深厚了。突的，天空骤然的落了几点前奏的急雨，跟着，便滂沱的落了下来，打得屋上的亚答叶，发着的的达达的交响，下得那么紧，把一切的声音都湮没了咧！

伴着急雨而来的狂风。从缝隙呼呼的吹来，寒冷得令人打颤。连那四处肆虐的蚊子，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只有屋旁那株高挺的野棕榈，摆动着阔大的羽叶，在暴风雨中得意地沙沙曼舞着。我们也不便再多看了，怀着愤恨的心情，多半蜷伏在凳上睡去。寒冷的夜，越更阴沉下去了。¹⁶⁷

随着张大嫂被“日本鬼”强奸的惨剧发生，这些长久以来人们与之共处，在其间生活、畜牧、种植的熟悉景观，也“寒冷”、“阴沉”、鬼影绰绰起来。文本通过对视觉、听觉、感觉、乃至气压、周遭的生物等多方位的描写，将战争中随时会被残害的、飘摇的个体命运融入了雨林深夜的狂风急雨之中。在独特的本地景观中所发生的伤害事件，实际上更加烘托出了战争的残酷和入侵者的丑恶。森林环境尽管有其自身的凶险之处，但常年同它打交道的人们也已经同自然、同彼此都产生了一种默契：夜行是非常不便的，在这正是野兽出游觅食的时候，一不小心，便会遭受意外的危险……一间（亚答屋）建在路旁，以我们流浪人的经验来看，就知道是一间简陋的咖啡店了。因为在热带芭洋里，不管如何人迹稀疏，荒凉冷落的地方，只要有公路，在旁边总会看到这些小野店；而店铺也大同小异地架着楼棚，用来招呼没处投宿的旅人过夜的。¹⁶⁸这种当地人同他们扎根的土地之间的深厚联系，从一位印第安酋长在土著美洲人不得不割让土地时的讲话中可见一斑：

每一个山坡，每一个山谷，每一个平原和树林，都因在早已逝去的日子所有过的那些悲伤或快乐的经验而神圣化了。即便是那些在寂静的海岸被阳光所炙烤着的，状似悄无声息的岩石，也会为那些与我的族人生活相关的事件的回忆而激动不已。¹⁶⁹

¹⁶⁷ 《芭洋上》，页 22-23。

¹⁶⁸ 《芭洋上》，页 15。

¹⁶⁹ Bagley, Clarence B. "Chief Seattle and Angeline." *The Washington Historical Quarterly* 22, no. 4 (1931): pg. 225.

南洋的这片雨林，也已在多年的摸索、相处之中，达成了人与自然共同生存的平衡，但入侵者将其撕开了一道血腥的裂口，从此人们在这片土地勤力劳作，“好好过日子”的日常，被“巡逻的或是站岗的日本鬼子”彻底破坏。他们比夜间觅食的猛兽更为残暴，老虎、金钱豹、山猪群、大野象虽然整夜发着怪声，“但到现在还没发生过噬人的事”¹⁷⁰，入侵者则避无可避，即便是在家中，也难逃突如其来的“噬人”侵害。《芭洋上》对于热带雨林景观的描写是清婉的、抒情的：威严的太阳，快要落到西边的山背了，它的猛烈的光度，反射着整个辽阔的天空，映出了镶着一块块彩虹色的，草青色的，驳杂的大鱼鳞片，连那几朵雪白的浮云，也给抹上一层薄薄的胭脂了。大地已经开始转为温暖，微风轻轻拂来，也感到有些凉爽的意味。¹⁷¹这些“悄无声息”的景观之中，无不透出对于整片雨林、每个细节“激动不已”的共鸣。但另一方面又显露出无法忽视的创伤来：乌乌啼叫着的成群结队的长尾猿，“显得分外凄凉和悲伤的，像一群无家可归的游子，对着被烧毁的满目疮痍的田园哭泣一般，使我们这群同病相怜的行脚人，禁不住也感到鼻酸了。”¹⁷²在自然风光和日军兽行的强烈对比之下，主人公“我”的脑海里翻滚着激烈的呐喊：“在这苦难中的马来亚和中国啊，多少人正在给日本鬼子兽性的凶暴的摧残呀！”¹⁷³小说植根于南洋雨林的同时，也道出一种普遍的心声，“对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不幸受到战争牵连的无辜民众来说，战争意味着烧杀抢掠的士兵、荒芜的田地和大火蔓延的村庄。如同天启四骑士带来灾难毁灭世界一样，战争通常伴随着饥荒、瘟疫和死亡。”¹⁷⁴在这片浩瀚无垠，又伤痕累累的热带雨林中，勤恳朴实的当地人对于远方国度同样发生着的战乱的愤懑与忧虑，将对战争的思考与对和平的渴求，延展至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显现出对于土地、对于生命的浓厚关怀。

第四章 战争、记忆与遗忘

在直接以战争时期为背景，通过在场的经验描述与记叙战争场景的文本之

¹⁷⁰ 《芭洋上》，页 21。

¹⁷¹ 《芭洋上》，页 14-15。

¹⁷² 《芭洋上》，页 14。

¹⁷³ 《芭洋上》，页 23。

¹⁷⁴ 詹姆斯·希恩著，贾青青，李想，刘辛未译《暴力的衰落：战争与和平，现代欧洲的转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页 25。

外，另有一类作品同样值得关注，即以后世的角度出发，挖掘已成为“记忆（memory）”的战争中所承载的历史与创伤的印记。其中尤以希尼尔（1957-）创作的一系列微型小说为代表，追溯历史，审视当下，在被其喻作“浮城”的新加坡，用文字完成过去与现在的记忆存档。¹⁷⁵显而易见的是，“记忆”在这些作品中具有多种维度的体现，在探讨具体的文本之前，有必要对“记忆”这一概念进行一定的梳理。事实上，“记忆”的研究由来已久，在早期的相关著作中，记忆被认为与空间知识、过往事件、时间转移、身体秩序等相对应，但随着印刷文化的出现，感官所引发的“记忆”氛围便被文字和摄像式的“记忆”所取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者开始以荣格（Carl Jung, 1907-1961）的“集体无意识”为基准，追溯“记忆”对于文化认同的影响。以这一层面来看，不同族群与文化都会建构不同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记忆”不仅和多元文化族群中的语言、叙述、地方景观等密切相关，与遗址、纪念碑、纪念馆之间的关联也难以一分为二。然而对于丢失历史与过往记忆的担忧亦早已被阐明：在“如此健忘、如此失忆”的年代，如何铭记、镌刻和追述族群的记忆与创伤，成为“失忆的世纪”必须面对的课题。¹⁷⁶身处“浮城”，对原乡的追逐余温尚存，都市文化就已经迅速崛起，接连的剧变更是加速了失忆的发生，“记忆”在同一时空内出现了严重的断层。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曾指出，当我们研究“过去”的时代，研究遥远的世界，这时候一种“现在”便涌现在我们心头。¹⁷⁷希尼尔在诸多以战争为主题的小说中，正是通过对“过去”战争经历的召唤，来进行对于“现在”的观察与省思，揭示幸存者经久不愈的创伤，加害者对历史的篡改，受害者后裔的历史健忘等现实，以微型小说的形式承担记忆与记载的功能，作出抗争健忘与失忆之尝试。

一、作为“历史记忆”的战争

¹⁷⁵ 希尼尔在《跨世纪的华丽与荒凉》一文中曾提到一种看法：本土华文文学的创作与其说是一种艺术表现，毋宁是一种心态的存档。多年以后，当流失与流落的感慨开始在历史的浅滩浮现时，我们庆幸还有一些足（祖）迹可寻。见《退刀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8），页163。

¹⁷⁶ 廖炳惠著《关键词 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155-157。

¹⁷⁷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页5。

美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 1948-）曾在谈论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时发出过一个深刻的提问：当最后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去世之后，记忆会变成什么样子？¹⁷⁸要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必要涉及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交汇地带。从考虑记忆私人性的角度出发，一个人的记忆不可能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记忆中，对于主体的所有亲历体验来说，记忆，作为“我的”，是属于我性、私有财产的一个典型。¹⁷⁹因为性格各异，生活环境不同，每个人的记忆能力彼此也都是不一样的。但个体记忆仍然是集体记忆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对于每个印象和事实而言，即使它明显只涉及一个特定的个体，但也留下了持久的记忆。同一群体的成员以一种普遍的态度和自有的逻辑，展现出记忆的相似性，也就是说，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¹⁸⁰而历史记忆则不同于生理和心理行为，它指的是过去的一些情节可以通过叙事形式加以讲述。叙事性的解释以社会结构和连续性作为自己的主要特征，正是在这种叙事框架中，个体和集体的认同才能形成并得到传播。¹⁸¹出生于一九五七年的希尼尔并未实际经历过太平洋战争，这场战争对他来说不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而是“历史记忆”，他在小说中通过战争叙事，来联结过去的创伤与当前的文化，并以此剖开“记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现实。

希尼尔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战争亲历者的形象：《退刀记》中的老妇人，《横田少佐》中“我”的祖父和横田先生的祖父，《认真面具》中浩原的爷爷，《异质伤口》中男子的祖母。他们中有的仍传述着个体记忆的幸存者，有的是已在战争中长眠的逝者，有的则是在被重写的历史中毫无忏悔之意的加害者。《退刀记》在短短几组对话间，引出了一段悲痛的家庭惨剧：老妇人坚持表示“这把刀太阴冷，用了令人厌恶心寒”¹⁸²，并告知店员这是在以前杀了不少人的凶器，自己的老伴还有幼弟全家，都被这把刀所杀害。店员十分不解，因这个牌子与款式是市面上流行的最新设计，在仔细观察了刀子以后，

¹⁷⁸ 帕特里克·格里著，罗新主编《历史、记忆与书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页129。

¹⁷⁹ 保罗·利科著，李彦岑，陈颖译《记忆，历史，遗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121。

¹⁸⁰ 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页92-94。

¹⁸¹ 德兰迪·伊辛著，李霞，李恭忠译《历史社会学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页580。

¹⁸² 希尼尔〈退刀记〉，收录于《退刀记》，页10-11。

发现上面写着“日本制造”，而老妇人所说的屠杀，则发生在南京。如此的恐怖经历成为了亲历个体的创伤记忆，即使已经事过境迁，受创者还是会不断在脑海中重新经历创伤事件。正常记忆是通过言词述说的线性故事，并能将此陈述置于个人生命史的正常章节，但创伤记忆则受到“顽念（*idée fixe*）”的支配，将发生的事停留在固着意念。¹⁸³《退刀记》中老妇人对于这把“最新”的刀子的厌恶、心寒，亦是一种体现：

“有，有，杀了人……”

“您看见了？”

“哦，这——倒没有，我若看见，我也没命了。”

“那可别乱说，小心警察找您问话。”

“但是，我老伴，还有幼弟全家是被杀了！”

“全家！真的？报警了没有？”

“没有！不可能的……凶手还歪曲了真相……”

……

“老太太，是在哪儿发生的啊？”

“南京。”¹⁸⁴

残酷的杀戮在她的生命进程中根植下了反复循环、又或直接停滞的创伤，“不该发生的发生了，任何对浩劫的见证，不能了断创伤，而只能成为创伤的延宕。”¹⁸⁵以个人记忆的角度观之，这种创伤在老妇人的记忆中不断地反复发生，或直接停滞在发生的时刻，成为毫无改变地重复经年的噩梦。但个体的记忆必将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因此要在亲历者仍能阐述时完成记忆的变形的紧迫感也随之而来。《退刀记》以叙述个体记忆的口吻，记录战争经验，并试图将之传承给没有亲历过的后代，实际正是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转化。亲历大型

¹⁸³ 赫尔曼著，施宏达，陈文琪译《创伤与复原》（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页33。

¹⁸⁴ 《退刀记》，页10。

¹⁸⁵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2004），页7。

创伤的体验，不能被笼统地视作私人经历（private experience），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受到创伤的、需要帮助的人得以现身，并且这种环境也决定了受害者如何转而成为幸存者的过程。¹⁸⁶《异质伤口》中同样是战争亲历者的男子的祖母，“一再告诉他，有关宪兵与良民互相对峙的故事，以及樟宜海滩上一字雁排行的肉体与机关枪互相纠缠的传闻——那是紫铜色子弹从祖父的第四根肋骨处挖出后所透露出的唯一令人信服的事实”¹⁸⁷。无论是《退刀记》中的“南京”，还是《异质伤口》中的“樟宜海滩”，都是对于战争记忆的清清楚楚交代。在这一层面上，叙述的诉求不见得是惩罚，也不是为了索赔，其首要的愿望是“交代、谈论过去，从而为逝者招魂”¹⁸⁸。老妇人控诉“凶手还歪曲了真相”，男子的祖母送到文物馆参加日治时期文物展览的紫铜色子弹，则是“唯一令人信服的事实”。詹姆斯·芬特雷斯（James Fentress）和克里斯·威科姆（Chris Wickham, 1950-）在《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一书中如此论述：

尽管记忆本身是主观的，但它同时也由语言、教导、观察、集体持有的观点，和与他人共享的经历构成，这使得记忆也具备其社会性。当我们记忆时，我们将自身展示给自己和身边的人。我们的“本质”，我们真正是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被揭露和表述：“我们记忆什么，我们就是什么（we are what we remember）”。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我们记忆的方式，我们在记忆中展示自己的方式，我们通过记忆定义个人和集体身份方式，我们在记忆中编排思想的方式，以及我们将记忆传递给他人的方式，就是在研究我们自己。¹⁸⁹

文本通过幸存者的叙述，让逝者与生者，亲历者与后来人，在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变形之中完成了一场对话。《异质伤口》中，在“那么罗曼蒂克的餐厅里”与日本女友约会的男子，突然在对祖母经历的思索中，感到“一列宪兵的影子闪进他的眼帘，并持着刺刀呼喝着”¹⁹⁰。这一画面显然并非来自男子自身

¹⁸⁶ Derek Summerfield, “Addressing Human Response to War and Atrocity”, in Rolf J. Kleber, Charles R. Figley and Berthold P. R. Gersons eds., *Beyond Trauma: Cultural and Societal Dynamics* (New York: Springer US, 1995), p. 19-20.

¹⁸⁷ 希尼尔〈异质伤口〉，收录于《退刀记》，页 91。

¹⁸⁸ 帕特里克·格里著，罗新主编《历史、记忆与书写》，页 130。

¹⁸⁹ James Fentress,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1992), p. 7.

¹⁹⁰ 《异质伤口》，页 91

的个体记忆，而是通过祖父身上挖出的“紫铜色子弹”和祖母的叙述获取的传承的记忆。当其被讲述、被记录时，这些记忆就定位到同一个群体之中，群体的其他成员便以相同的观念体系，去思考和体会其具有的意义。并未亲历沙滩屠杀的男子，在数十年后的餐厅里却想起宪兵持着刺刀呼喝的画面，这有别于“顽念”，而是一种“记忆的恢复”。在这些记忆的延续之下，男子眼中的女友早春芳子，不再是“在异乡谋生时相遇相恋的年轻女子”，而是侵略者的后裔。正同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所言，“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思考。……我们必须沿着他人假如处于我们的位置也会延循的相同道路前行，但这就已经足够了。”¹⁹¹以记忆交代、以记忆招魂、以记忆铭记，便也是重寻战争记忆的意义所在。

希尼尔通过作品回溯和传承战争记忆，反映受害者创伤的同时，亦以此作为与侵略者及侵略者后裔记忆的对峙。《横田少佐》和《认真面具》都以双方记忆的冲突，对扭曲历史、抹杀事实、毫无忏悔之意的侵略者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横田少佐》中，在“皇军进出”时被杀害的战争受害者的后裔“我”，在接待曾被排遣到昭南岛的“昭南市政会”成员的后裔横田先生时，难以抑制心中强烈的抗拒感，却发现他对于残暴的入侵事实有着另一套认知：

“横田先生，你应该随你的祖父一同前来才对，他可以告诉你更多的过往。不是吗，不久前就有一批前朝遗老来这儿威耀一番。”

“哦，不，家祖以前在这儿只居留一段非常短的时期，后来因病回国，——何况，近年来他不良与行……”

“不然，他会再度南下‘进出’一番？……”我有点冲动地打断了他的说话：

“历史是一切过往的见证，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评价。”

“是的，祖父说过，他们当年被遣派昭南岛，担任保护八十万市

¹⁹¹ 《论集体记忆》，页 94。

民日常生活的职责是有待评估的。”

我的天！我不再开口。脑子是有点儿混乱。大屠杀、良民证、光荣圈、宪兵队、慰劳所、奉献金等等似曾相识的名词，在我脑海里翻滚着。¹⁹²

记忆并非对于过去的忠实记录，而是对它的不断解读和诠释，记忆也有可能被改写。¹⁹³战争受害者所经历的漫长的、充斥着血与泪的日子，对受害者后裔而言“很难忘怀”，“在南京街吃午餐时，我想起了南京”，“在伊丽莎白道，我们蹲在林谋盛烈士的纪念塔前拍鱼尾狮的英姿时那一股无名的感触”，属于一个群体的创伤，冲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却在入侵者和入侵者后裔的叙述中，被改写成一种“不曾发生过”的记忆。横田面对“我”告诉他的死难事实，“惊慌”而“狐疑”，“祖父不可能欺骗我啊！他说当年是来这儿保护市民的！”和“我的祖父也不可能欺骗我，他确确实实是躺在里头。”两句简短的对话，却是长久以来历史真相浮沉不定，入侵者否认暴行本身的存在，更遑论“忏悔”与“自责”的写照：在《退刀记》的老妇人和《横田少佐》的“我”记忆中难以磨灭的“南京”记忆，在各类目击及史料证据的支持下，“当时非常清楚而且今天仍然非常清楚的是，一九三七年末和一九三八年初在南京发生了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灾难性事件。”，日本人却在公报中把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屠杀委婉地称为“扫荡”行动，似乎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的罪行。¹⁹⁴同前文所述，强奸是日军进入南京后的常见事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曾写道，下至十岁，上至七十岁的女性都惨遭强奸，一些带头参与暴行的军官将他们的营房变成了后宫，每晚都换一个新的被俘获的女性，直接在露天处实施侵犯也绝不少见。斯诺认为这个强奸、残杀、掠夺的人间地狱，“在现代没有任何一处能与之相提并论”。¹⁹⁵东京审判根据有关证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性犯罪达两万件

¹⁹² 希尼尔<横田少佐>，收录于《退刀记》，页 19。

¹⁹³ Patrizia Viol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Alastair McEwen, *Landscapes of Memory: Trauma, Space, History* (Oxford: Peter Lang AG, 2017), p. 9.

¹⁹⁴ 何铭生 (Peter Harmsen) 著，季大方，毛凡宇，魏丽萍译《南京 1937：血战危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 273-274。

¹⁹⁵ Edgar Snow, *The Battle for Asia* (Canada: Random House, 1941), pg. 57.

之多，对此，日本有人表示不满，以为是对日军的栽赃。参加进攻南京的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的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在东京审判出庭作证时，声称日军对南京秋毫无犯；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大佐在出庭作证时说：“在南京，由日本军进行的有计划的强奸完全不是事实。少数散发的风纪犯有过，但所有这些事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¹⁹⁶而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所在地新加坡，日军占领本地后，便开始了“检证”清洗，自二月二十一日至该月月末，十八至五十岁的华人男子被要求到检证中心报到，一旦被判定为是抗日分子，便会被装上卡车，拉到偏远地带，被机关枪或刺刀杀害。¹⁹⁷日军宣布约有 5000 名华人被害，但非正式统计约有 25000 名华人被害。¹⁹⁸然而现实却是，侵略者的后代连对这已然经过大幅篡改、掩盖的历史，都毫无概念：

“哦，长生殿。”我有意无意地说着：

“那年你们的祖父留下的一点纪念。”

“你是说他们出钱建的？”横田认真地说。

“不，是他们提供机会罢了！”

.....

“这石碑，是对当年许许多多蒙难同胞的一种纪念与追悼。”

“多少？”

我出示了手掌。

“五十？”

我摇头。

“五百？”

摇头。

¹⁹⁶ 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页 259-260。

¹⁹⁷ Mark Stille,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2: The Fall of Britain's Empire in the East*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16), pg. 92.

¹⁹⁸ 陈鸿瑜《新加坡史》（新北市：台湾商务，2017），页 40。

横田走到我眼前，一脸狐疑：

“你没有开玩笑吧？难道是五千？”

我没有回应，我不想让他知道正确的数目，他还没有这个心理准备，让历史告诉他吧！清白的历史是不会说谎的。¹⁹⁹

在“我”因每一处与战争相关的地点而产生对战争回忆的联想时，横田先生却对祖辈的所作所为缺乏基本认知，“认真地”认为他们所行的，是“出钱建长生殿”、“保护八十万市民日常生活”之事。在面对“‘皇军进出’时无辜被杀”的蒙难者的骨灰坛时，方才对闻所未闻的战争事实有了冰山一角的接触，却仍对“祖父当年是来这儿保护市民”的谎言抱有幻想。更为讽刺的是，入侵者实际并非对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和伤害一无所知。“我”在市区“夕阳、浮雕、车浪、晚霞”的“安详图景”中，“想起广岛核爆，片片残瓦，层层钟声，串串纸鹤，和平雕像，小女孩的心声，慰灵碑，一切的一切……”²⁰⁰，受侵略地如今趋于宁静的图景被横田记录在照相机中，横田所属的群体经历的“核爆”、“残瓦”的创伤记忆，以纸鹤、雕像、慰灵碑等形式被记录和纪念，唯有“确确实实是躺在里头”的“我”的祖父，成为了横田视角下沉默的亡灵。“被建构的、可操纵的历史”在反映已知的过去的同时，也常常在不同的节点开始和结束，并且历史往往始于一个族群的祖先成为不正当侵略的受害者之时。²⁰¹在“太平洋战争侵略者”和“广岛核爆受害者”两个身份重叠的情况下，横田对二者的认知，便可见历史被操纵的偏向。正同中国历史学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张宪文（1934-）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总论中所言，日本的一些人“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也给日本民众造成了错觉。”²⁰²在双方的集体记忆产生冲突之时，文本作为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历史记忆，承

¹⁹⁹ 《横田少佐》，页 20-21。

²⁰⁰ 《横田少佐》，页 20。

²⁰¹ 罗伯特·莱顿著，魏澜，纳日碧力戈译《秩序、失序与战争：社会适应与社会信任》（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页 114-115。

²⁰² 张宪文主编，马振犊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六十五册 南京保卫战军宪警阵亡名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页 4。

载着对“记忆”和“过去”的深刻关怀：“不仅将过去视为过去，还有关于过去的记忆”，在这一特定的记忆中，“过去”存活着，“现在”形成着。²⁰³

《退刀记》中的亲历者老妇人，《横田少佐》中的后裔“我”，身处新加坡的土地，有关于“南京”的创伤记忆历历在目，有关于祖辈在五角基“登上夜行车，就不再回来了”的真相铁证凿凿，亦以“凶手还歪曲了真相”的控诉和“清白的历史是不会说谎的”之信念，表述了对于复原历史，摆正事实的决心。

二、记忆与场所

与《横田少佐》相类似，《认真面具》中双方战争记忆的冲突，同样发生在具备纪念功能的场所：圣淘沙和纪念碑。不同的是，相较《横田少佐》中仅有两位后裔在场，在《认真面具》中，“南来怀古的前朝遗将”老人、老人的孙子浩原、在碑前等待春祭的老妇人，以及带浩原祖孙俩参观新加坡的“我”，在这个故事中处于同一维度。文本将这些个体的战争记忆置于特定的场所之中，借由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场所之间的碰撞，显现出对于历史的召唤和对于创伤的关怀。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 1931-1997）曾指出，城市本身就是市民们的集体记忆，而且城市和记忆一样，与物体和场所相联。城市是集体记忆的场所。其中的一些建筑物长期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具有一种持续的活力，而在另外一些时期里它们耗尽了自身，只留下经久的形式、实体标记和地点。²⁰⁴《认真面具》中的圣淘沙则微妙地处于两种形态之间，它一方面已经经历了时过境迁的变化与消耗，与实际的战时情境大不相同，一方面又在同样的实体标记和地点中，进行着对于战争记忆的保存和重现：圣淘沙在一九三零年代已成为新加坡的炮台要塞和皇家炮兵基地，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圣淘沙部分地区（包括西乐索炮台）成为战俘营。一九七二年，圣淘沙改名后发展成旅游胜地，现西乐索炮台景区里共有三个地道。地道 C 为地下弹药库，可以看到把弹头和药筒运送到大炮的机制，还有蜡像展示炮兵部队在弹药库工作的实际场景，大炮指挥塔则重现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新加坡战役的场景。

²⁰³ 《历史、记忆与书写》，页 131-132。

²⁰⁴ 阿尔多·罗西著，黄士钧译《城市建筑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页 59，130。

地道 B 呈现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的战俘生活，也复制士兵在隧道里工作的场景。地道 A 通往圣淘沙西部最尾端的西乐索角（Siloso Point），重现当年的射击指挥塔。指挥塔前面是炮位遗迹，摆着 12 磅速射炮的复制品，真品在一九四一年也在这里部署，但从未开火，最终在英国投降的前一天被扔下悬崖。旧蜡像馆也迁至西乐索炮台，为投降纪念馆（Surrender Chambers），重现一九四二年英军向日军投降，和一九四五年日军向盟军投降的历史场景。景区内的其他军事建筑，如避弹堡、引擎室、仓库等，也改成展馆，呈现战争年代的新加坡。²⁰⁵在同时见证和收纳了战争事实的场所之中，《认真面具》对前来参观的入侵者与入侵者后裔进行了如下的描写：

接下来的展出，有过度煽情的画面：主角是一批披上军装的恶客，道具是一排排老百姓的尸首，背景染有一片血色的天空。

“这些都是真的？”问者竟有两种声调。然而他俩的表情没有令我感觉到虚假的模样。虚假的只是掩饰的历史。我想。

“不可能啊？你看，这些地方我不也曾去过，只是……”制造历史的老人并不晓得历史有被剪接的可能。他的神情，比困扰的浩原，略为沉重……²⁰⁶

在见到这些被“掩饰的历史”的证明之前，老人“以侵占国军人的身份，对曾占领土地的回忆，似乎没有愧疚之意，却仅止于对当年英勇事迹的一种追怀”²⁰⁷，但面对如此截然不同的记忆，他产生了沉重的疑问。至此，关乎战争真相的亡者的记忆，取代了蜡像、展出、复制品的存在，“隐喻成了现实，缺席成了在场”²⁰⁸。受害者的个体记忆得以通过这样的场所被保留和传承，变形成足以让“我”分辨“虚假的”、“掩饰的”历史的集体记忆，并具备充分的证据和力量与之抗衡，抨击其对历史真相刻意且恶意的扭曲和剪接。

²⁰⁵ 吴彦鸿《新加坡风土志之二——名胜古迹》（新加坡：宏砚工作厅，2021），页 173-175。

²⁰⁶ 希尼尔〈认真面具〉，收录于《退刀记》，页 85。

²⁰⁷ 《认真面具》，页 84-85。

²⁰⁸ 《风景与记忆》，页 26。

相较《横田少佐》中“我”与横田在纪念碑旁关于祖辈记忆的僵持，《认真面具》中对于纪念碑的描写，更接近于一次关于“过去”对“现在”遥遥相望，又无限重叠的回声：

“我想起古代的某剑客！”老人说：“在寻求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他把最强的对手一一扳平了；过后，仅仅一念之差下，竟解决了全村的人，从此，便不再回归。后人在似真似幻的传说中断定，因为剑客的内心十分苦闷、孤寂，并带有仇恨……”

一个叫做“屠杀”的名词在我脑海中闪现。思索中我把目光转移到浩原，他那黧红的脸泛着房外的月光，他指着朝南的窗外那高耸的浮雕说：

“那是什么？”

“纪念碑。方圆十里，数这座最悲情！”我往落地窗前走去。远方那石柱，在这堂皇的旅店外显得格外渺小，我面向他，以无需求证的口吻说道：

“那是纪念某年当地的平民历经一次‘进出’的教训而建的。”

209

德国哲学家卡斯腾·哈里斯（Karsten Harries，1937-）对于过去和现在、亡灵和生者有着这样的论述：我们的过去使我们成为现在这样的人，否认我们的过去一部分意味着否认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而我们必须要肯定过去以肯定自己；这个过去并非始于我们的出生，它包括了我们的父母、祖先、朋友或团体——这些对于我们的形成都有帮助。过去的权威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存在中。这个过去发出了诸多声音，把英雄和反面人物呈现给我们，把会引起重蹈覆辙的典型例子提供给我们；只有发现值得仿效时，过去的行为才会被重复；并且这种价值判断需要一种典范——它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脱离过去，而是必须解释过去。与过去决裂也必然意味着在自我内部的决裂，这种决裂会以人们猜想的被草率埋葬的亡灵侵袭生者的同样方式降临到个人身上，而对个体适用的也适用于群

²⁰⁹ 《认真面具》，页 86-87。

体。²¹⁰在侵略者用“一念之差”的剑客传说，试图对在历史事实面前难以解释的记忆进行掩饰的时候，“我”以“无需求证的口吻”向浩原讲述着真相——由此可以窥见，文本中浩原仅有的三次发问的涵义，“这些都是真的？”、“这些都是真的吗？”、“那是什么？”，除此之外，他无从开口，总是“沉默不语”的、“困惑”的。在这种茫然和不明真相之中，显现出的是一种自我内部的决裂，“爷爷意气焕发的年代”对于目睹了历史证据的浩原而言，不是因“来不及参与”而无法理解，而是因其与真正的过去脱离而无法解释。

更耐人寻味的是，用以纪念和缅怀战争死难者的纪念碑，在无声地对入侵者的谎言施压的同时，也是老妇人追悼冤魂的场所。正同建筑历史学家罗伯特·佩尔特（Robert Jan van Pelt, 1955-）所言，“城市的公共领域由市民的现在、将来及过去的行为所构成，其转化为一种三重性的公共时间，由生者的时间、城市的时间和死者的时间所组成。”²¹¹纪念碑作为“具有高可见性和公共意义的吸引物”²¹²，无疑是这三重时间的交汇点：

突然，碑的一隅，我们竟然望见有磷磷鬼火在闪烁。经过一阵犹豫后，决定下楼寻火去。

碑给人的感觉，在这个暗淡的月光下，是凄壮的。因为风的缘故，一片片刚燃尽的冥纸——就如老人的家乡那撕落的佛面——随意飘了起来。在摆放灰瓮的石柱前，有一老妇人，以一种宽怀的姿态侧卧着；良久，不动，似乎有此生不渝的回忆一再萦绕这片可以被纵容的大地，以及继续带有伤痕的心。我忖度——而浩原不一定能了解，她老人家正要赶上明早一场追悼五十载冤魂的春祭。²¹³

纪念碑是生者对亡者的纪念，亦是亡者对生者的呼唤。越战纪念碑在给所有设计竞争者的“规则说明”中，要求纪念碑应当“缅怀这场战争的死难者、失踪者和退伍兵的贡献，而不是战争本身。这个纪念碑应当是抚慰性的，并超越战

²¹⁰ 卡斯腾·哈里斯著，申嘉，陈朝晖译《建筑的伦理功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页288。

²¹¹ Robert Jan van Pelt, "Athenian Assurance", in Robert Jan van Pelt and Carroll William Westfall, *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istor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83.

²¹² 《空间与地方》，页130。

²¹³ 《认真面具》，页87-88。

争的不幸。”²¹⁴在《认真面具》中，有老妇人在前为冤魂燃着冥纸的纪念碑，不仅包含着死别的凄切，同时也显现出一种永世不朽的壮烈。“那个时代，人人都可能是烈士”，“烈士的那种眼神，宽恕中带有几分不甘！”²¹⁵尽管文中两次以“宽恕”与“宽怀”，分别与死难者和幸存者的形态相联系，但同时也用“不甘”和“带有伤痕的心”，来强调这种此生不渝的创伤。可见，其诉求并非是仇恨和宣泄，而是一种超越战争的铭记与追怀。战争死难者的“墓志铭不是铭刻于记功柱上，而是以不成文的文本铭记于人们的心坎上，成为每个人心目中的圣地。”²¹⁶如此沉重惨痛的记忆，无疑是构成“逝去的人、活着的人和尚未出生的人组成的联合体的‘真正自我’”²¹⁷的重要部分。死者长眠于战争之中，但历史向着未来延伸，逝去的人成为生者出生之前的自己，成为扎根于生者存在中的“过去的权威”。于是正同小说的结尾一般，在老人避而不谈史实，朦胧地诉说着“忏悔”、“新生”之时，浩原仍在疑惑和不解之时，“我”不再多言，一行人寻到纪念碑前，看老妇人亦是默然地，正要赶上明早的春祭。“我”和老妇人的不语，正是对于被蒙上真真假假面具的历史，以及至今不愿直面真相的入侵者的无声抗议。《认真面具》发表于新加坡沦陷五十周年之际，一方面在文本的想象世界中注入了“真实”²¹⁸，建构出一个死难者、幸存者、入侵者、后裔，亦或过去、现在、死者、生者交错重叠的特殊视点，一方面也在作品完结的一刻，以小说中“追悼五十载冤魂的春祭”与实际的“沦陷五十周年”重合，暗淡月光下凄壮的纪念碑与现实中同样矗立的纪念碑重合，将尚未明朗的“真实”重新抛入了外部世界，探寻关乎个体与集体、历史与真相的答案。

三、记忆与遗忘

当小说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揭示战争所留下的创伤，要求正视与铭记历史

²¹⁴ 《建筑的伦理功能》，页 295。

²¹⁵ 《认真面具》，页 86。

²¹⁶ 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页 200。

²¹⁷ 锡尼萨·马莱斯维奇著，田宏杰等译《战争与暴力的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页 49。

²¹⁸ 安敏成曾指出，在想象的世界中注入的“真实”，能够有效地使批判的头脑摆脱传统的束缚，从而构建出一个特许的观物视点。见安敏成著，姜涛译《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页 17。

的时候，其一方面对于入侵者的篡改和掩盖进行了控诉和抗议，一方面也在字里行间，表现并批评了部分国人对于历史的遗忘与无感。这并非想象世界的担忧，而是现实对于“记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其中一种回应：在新加坡旅游局官网对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介绍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如今，新加坡的许多年轻人也许对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历史意义已经没有太多的概念，只是一味将纪念碑昵称为‘筷子’”。²¹⁹崇高庄严的纪念建筑在“没有太多概念”的历史健忘症中崩塌成形似“筷子”的无意义几何体，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不可忽视地浮现于现实，亦穿梭于文本。

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œur，1913-2005）在谈论过去的转让问题，即“必须谈论过去吗？如何谈论过去？”时，将记忆和遗忘的交错称作是“发生内讧的集体记忆的浑水”²²⁰。不约而同地以“水”的形态来对不同代的历史经验进行解释的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1947-）的阐释，则能为接下来对文本的分析，提供一个精细的框架：

……社会的一代的人的存在像是“水砖”。这一奇妙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来自一位重建某古印度教仪式的印度学家。在这一仪式中，牧师的任务是，通过诵读不同的“水砖”将一口想象中的水井填满。谁若仅仅抓住年份的实际统计基础不放，那么他看到的仅仅是飞逝的流水并从根本上否定代际概念的功能。然而定义一代人的并不仅仅是出生日期，还有类似的经历和挑战，交流和话语，以及累积经验的集体模式和以回顾历史的方式进行的身份构建。同年出生的人是保持砖块成型所使用的黏土，而砖块的形状则是某种想象，是一代人在其所体验的经历与随后的阐释这两者的相互关系中所得到的。这一想象并非不真实，只是它直接地渗入到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实践中，从实质上共同规定了个人的自我认识和方向性。嵌入时间的日常生平和与社会话语的联系共同组成了某一

²¹⁹ 坐落于美芝路政府大厦草场东侧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由四根形状和结构一致的巨型石柱组成，高 65 米，高耸入云。四根支柱象征着新加坡的四大种族共同经历的苦难，更为纪念那些遇难并长眠于此的四大种族人民。其伫立在一块墓地之上，下面埋葬着从各个乱葬岗挖掘出来的遇难者遗骸。每年的 2 月 15 日，这里都会举行二战蒙难者追悼会，向亡灵致意，并谨记战争之痛。见新加坡旅游局官网：<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history/memorials/civilian-war-memorial/>

²²⁰ 保罗·利科著，李彦岑，陈颖译《记忆，历史，遗忘》，页 604。

个人的代际身份，这是由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文化性因素共同构成的。²²¹

可以观察到，在文本的呈现中，这种“内证”往往以不同的“代”的形式被阐明。《横田少佐》中的“我”作为战争死难者的后裔，保有祖父“登上夜行军车，就不再回来了”的记忆，“大屠杀、良民证、共荣圈、宪兵队、慰劳所、奉献金”等名词也是“似曾相识”，然而“我”的两个小侄，“正等着用车，听说——听说晚上有个西城秀树的演唱会”²²²，他们必然不会和“我”一样，在南京街吃午餐时，会“想起了南京”。《布拉岗马地》中的老爸，对于临海的木屋有着如此的记忆：

“……日本占领时期，凸角那边的海湾，杀死了不少人——”或者他指着那个堆有大秃石的小岛，十分无奈地摇头：

“——以前英军的大炮舰，曾经撞到上面去！”

最后一夜，还记得他心事重重，望着远方：

“看到对岸吗？以前就叫做龙牙门……”

朦胧中我们不知道他指的是何处，好像是灯火突明突暗的码头。²²³

而在“我”，“一个满脑子理想与梦想的年轻人”眼中，这就只是“偏僻落后的小地方”。在这两个文本中，最年轻的一代没有直接通往过去，与历史相连接的时间线，而只通过文字或影像，或是经过小说和影视改化的内容去“旁观”历史。与此同时，新兴的社会文化性因素，例如流行文化、对个人理想的追求等，更为强烈且直接地渗透进这一代人的日常之中。学者曾提出，完成记忆的代际循环需具备四个要素：第一，记忆某个集体或个体创伤事件所需的心理距离的存在；第二，举行纪念活动所需的社会资源的积累；第三，亲历者渐进式的衰老和选择性的记忆/遗忘；第四，这个过程对于社会政治的影响。²²⁴以此为基准，那么文本所关注到的现状就是，记忆的代际循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故障，

²²¹ 阿莱达·阿斯曼著，袁思乔译《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页19。

²²² 《横田少佐》，页22。

²²³ 希尼尔<布拉岗马地>，收录于《退刀记》，页34-35。

²²⁴ Ron Eyerman, *Memory, Trauma and Identity* (Switzerland: Plagrove Macmillan, 2019), p. 27-28.

处于停滞乃至断裂的状态之中：一代人还在经历遗留的创伤，一代人已经积极迈入都市化进程；一代人正与入侵者扭曲的记忆对峙，一代人已经在用消费选择证明，“他们依然是成功的，侵略别人不需要武力”²²⁵。“市场的繁荣取代了历史的震撼”²²⁶，不难发现，相较承载着历史和记忆的纪念馆和纪念碑，年轻一代的场所则与狂欢热闹的“演唱会”、承载理想的“城里”等密切相关。在文化商业化、文化现代化等观念的鼓舞之下，“有节制地挥霍的传统”和“对激情、情感的宣泄”进入了新一代的市场，“幻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不可能的梦想也可以得到表达”²²⁷。当他们与上一代人在同一处向远方眺望时，无法越过新的电子科技、新的消费方式、新的生活实践之印记，去真正地触碰和感知历史，因而眼前只有“突明突暗的码头”，不知道属于上一代的、在迥异的历史和消费维度中已经迷失了的记忆指向何处。

尤须指明的是，文本批评的是对于历史“冷漠”和“失忆”式的遗忘，是这种毫不关心和拒不了解的态度，而并非想让记忆变成由梦魇和迷幻交织成的“美丽的枷锁”²²⁸。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曾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一时刻，前后两渺茫的那一时刻，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的一个时刻的平静。书页不断从时间之书上掉下来，飘忽远去——可它突然又飘回人的怀中，于是他说：“我记得……”然后就嫉妒那兽类。兽类总是立刻忘记，并看着每一刻真正逝去，沉入到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消失。²²⁹尼采在这里批评了过分依赖于历史主义和历史记忆，使得记忆变成了沉重的枷锁，使得人类无法伸张强力意志、面向未来、创造崭新的文化，所以他认为“遗忘”也有正面积积极的功能，可以矫正历史主义、复古主义的弊端。不过，本章所关注的不是尼采的这种论述，而是恰恰相反，笔者要讨论的是“遗忘”的消极效果。“遗忘”在一些情况下，曾作为一种古老的策略，用以抑制战争记忆的爆发性能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所具有的被动性证明，仅凭“遗忘”是无法正确地处理创伤的过去的，“记忆”才是应对此类破坏性的和毁灭性的集体经验的唯一合理方式。这不仅

²²⁵ 《横田少佐》，页 20。

²²⁶ 《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页 20。

²²⁷ 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页 32。

²²⁸ 《历史、记忆与书写》，页 127-128。

²²⁹ 尼采著，陈涛，周辉荣译《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 1-2。

是有助于幸存者的治愈，同时也是对罹难者的精神和道德义务，其目的是将不对等的暴行经历（asymmetric experience of violence），转化为建立在对受害者记忆的同情和道德认知基础上的共享记忆（shared memory）。²³⁰然而事实却是，社会调查显示，有 10% 的新加坡年轻华人来世想当日本人，希尼尔在《我的来世不是梦》中尖锐地讽刺：

至于选做东洋人嘛，嘿！你没注意到我们周围都是 Japanese products——路上的汽车，家里的电器，办公室里的电脑、电话，街边的餐馆、卡拉 OK，哪一样不比他人强？日本高科技引导新潮流，年轻人人都很 cool，很 in！——还有，也不用浪费时间去学那要命的 Chinese！

231

这种抉择的原因与日本高科技产品大幅度挂钩，却“与民族的归属及荣誉感无关”²³²，更丝毫不顾及“精神和道德义务”。战争的创伤尚未愈合之际，“日资公司正式营业那一天，有二十万人涌了进去抢购”²³³，在侵略以经济殖民的形式卷土重来时，对历史冷感的国民用“遗忘”协同了它的发生。战后，日本以经济赔偿为诱饵打开东南亚市场，而新加坡本地又历经国家独立、经济发展、城市崛起、华校关闭、英文转为第一语言等诸多关键变化与重大事件，致使“代”的更迭呈现出愈发迅速与频繁的趋势，对于记忆与文化的心理距离也更为复杂和遥远。新加坡学者邱新民（1914-1995）曾这样形容“日本的世纪”的赓续：

日本在东南亚的统治，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不过三年多，按理日本投降后，日本的世纪该成过去，但就内在的精神说，日本的世纪却借尸还魂，阴魂不散，依然存在，那就是日本的经济淹盖了东南亚。

²³⁰ Aleida Assmann, “From Collective Violence to a Common Future: Four Models for Dealing with a Traumatic Past”, in Martin Modlinger and Philipp Sonntag eds., *Other People’s Pain: Narratives of Trauma and the Question of Ethics* (Ber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p. 49.

²³¹ 希尼尔〈我的来世不是梦〉，收录于《退刀记》，页 161。

²³² 同上。

²³³ 《认真面具》，页 20。

流于表面的消费追求、对于街头和生活中产品占比的粗浅观察，造成了遗忘历史与发展社会之间并行的假象。高速吞噬城市的消费主义虚壳之下，能够牢固地支撑自我，从而使群体紧密相连的历史认知和文化认同已岌岌可危：日本高科技、日本流行文化、日本产品是时尚潮流，而母语却是“浪费时间”和“要命的”。文本用“来世”的迷失投射“现世”的遗忘，又意在呼唤“前世”的历史。其所揭露的这种失忆的、错乱的现状，微妙地对应了爱默生所总结的“不可避免的深渊”，“这个深渊正是新生事物的创造为过时的东西打开的”，作者通过呈现这种冷漠的遗忘，将文本作为镜子摆在社会进程的面前，提醒社会不要忘记被它压抑的创伤性的基础。²³⁵事实上，重新开始所需的并非遗忘，而是记忆，因为新的开始无法从一片空白之上伪造而成。²³⁶正如张松建所言：“希尼尔描写历史记忆的纠缠和负担，预示着进路和可能性。……记忆可能是一种奴役力量，同时蕴蓄着解放的潜能。”²³⁷荒诞的“来世”想象之下，这种状似与发展步伐不甚合拍的省思，实则正是要激发一种严肃的、也是必须的文化力量，将作为重要起始和媒介的记忆归位，修复对于战争和创伤的失忆，真正地展望未来建立起社会与历史的牢固根基。

²³⁴ 邱新民《日本占领新加坡史话》，页3。

²³⁵ 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页478。

²³⁶ Aleida Assmann, “From Collective Violence to a Common Future: Four Models for Dealing with a Traumatic Past”, in Martin Modlinger and Philipp Sonntag eds., *Other People’s Pain: Narratives of Trauma and the Question of Ethics* (Ber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p. 54.

²³⁷ 张松建《记忆书写的诗学与政治——希尼尔小说综论》，见《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页104。

第五章 总结

本篇硕士论文从三个角度，即，性别政治、民族认同、记忆与遗忘的辩证，针对新华文学中的战争书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评分析。在战争与女性一章中，首先就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关于战争与性别关系的理论进行了论述，并以此为出发，对新华文学中的性暴力受害者、母亲，及敌方女性三类形象进行细致的考察。第一节，以郭宝崑的戏剧《灵戏》中的医疗队“姑娘”为具体对象，结合战争期间有关性暴力受害者的史料考证，关注对于发生在战争中的强奸态度“滑稽”的男性，和在历史叙述中“缺席”和“失语”的“被遮蔽”的女性。跟随文本唤起幽灵，与之对话的特殊形式，为受害者填补历史空缺，正视战时女性经历，挖掘其所揭示的战争与性别之关系。第二节，择取新华文学中罕有的，全然以“母亲”为中心描写战争的苗秀的小说《忌日》，参考对于男性“物理力量”和女性“道德力量”，正义战士（男性）和美丽心灵（女性）形象矛盾之处，以及女性与生育能力及孩子的潜在关系等理论论述，分析文本中的“老太”这一人物。通过观察老太在战争中对于亲生儿子的奋力保护，以及在儿子牺牲后将这种崇高的母爱转移到了侄儿阿庆身上的行为，来窥得在战争中被边缘化的“母亲”的话语残片。同时，也从其对于复仇的渴望、对于杀子仇人的愤恨等激烈的、直观的正面描述中，理解这一足以挑战“柔弱被动的和平制造者”定式的母亲形象。第三节，探讨新华战争文学中敌方女性形象的塑造，剖析其同时作为侵略者，以及被侵略方男性倾慕对象的矛盾形象之下，个人情感、国家意识、利害观念、人类真理的纠缠与冲突。同时以姚紫的小说《秀子姑娘》中的秀子为例，从家庭价值、不投降主义和自杀倾向三个方面，勘察从“个人的、主体的”思想及行为中所投射出的复杂内涵，继而以更具洞见和全面性的姿态，探究新华文学对于战争课题的书写与省思。

战争与民族认同这一章节中，笔者以相关理论及历史背景为基础，将新华战争文学中呈现出的民族认同划分为两个大的指向：中国认同和新加坡认同，并择选包括书写中国国内战事、新加坡华侨救亡、华侨本土认同，以及战时南洋景观的文本，探勘其中对于家国与认同的多方位思考。本章第一节以南来作家流冰的作品作为具体个例，探讨了文本中所体现的中国认同与离散民族主义。其中《在血泊中微笑》以上海为背景，叙写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

“王老爹”视死如归的英勇行为，字里行间皆流露出对于炮火中的故乡之关切；《云翳》则取材于南洋，体现以主人公黄启明为缩影的海外华侨不与汉奸同流合污，自身、后代都要做“堂堂的中华民族的子孙”之精神原则。在这一类作品中，祖国、故土指向遥远的中国，华侨即使身在海外，也同样抱有“同在一起”之信念，并坚定地为之奔走、牺牲。第二节则聚焦于新华战争文学中对于新加坡认同的书写。一方面，以苗秀的《红雾》和《火浪》为具体研究对象，关注以新加坡沦陷为节点的重大历史转折中，在马来亚土地上同生死、共患难的人们们的历史命运和心灵世界，考察认同和归属感在此时代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变化与迁移。另一方面，解析《火浪》和赵戎作品《芭洋上》对于战时新加坡景象的记叙，理解其“反映本地生活形态，刻画地方特色”的意涵。《火浪》对城市景观和《芭洋上》对热带雨林风貌的描写，反映出了战时新加坡特殊的地方经验，亦以广阔的视野，显现出对于战争的思考、对于和平的渴求，以及对于土地、对于生命的浓厚关怀。

战争、记忆与遗忘这一章节，则从在场的经验转到后世的叙述，以希尼尔的微型小说为例，探讨了战争作为“记忆”所承载的历史与创伤。第一节中，以对《退刀记》、《异质伤口》、《横田少佐》、《认真面具》的文本细读，勘察了作为历史记忆的战争所体现出的另一角度的意涵。回溯和传承战争记忆之意义，是对于受害者创伤的铭记，亦是对被扭曲、被抹杀的历史事实的还原与坚守。第二节则以多次出现的具备纪念功能的场所为切入，观察生者、死者与城市之间的交汇，在战争的死难者、幸存者、入侵者，以及未亲历战争的后裔，通过纪念馆和纪念碑这类场所，于文本中发生对话乃至对峙时，历史的“真实”便在想象世界与外部世界穿梭，微小说中无需多言的讽刺与抨击，也直击篡改和扭曲历史真相的入侵者。第三节则分析了《布拉岗马地》、《横田少佐》、《我的来世不是梦》等作品中，对于部分国人历史冷感症与健忘症的揭露和批评。在市场的繁荣取代了历史的震撼之际，历史认知和文化认同已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文本通过几代人对于历史感知的对比，甚至是对于来世的荒诞想象，敲响了正视历史，修复失忆之警钟。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曾如此解释在战争期间的写作困境：“你们会问：为什么在我的诗里/不再与我们谈起梦，谈起树

叶/谈起我国土上的巨大火山？/你们来看看吧，/鲜血满街流；/你们来看看吧，/满街都是血！”但奥登（W.H. Auden, 1907-1973）则表明，作家的声音能够，而且必须使满街的鲜血产生意义，用个人的声音来捍卫个人的价值，反对“折叠的战争谎言（the folded lies of war）”²³⁸。他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September 1,1939）》一诗中写道：

我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声音

打开折叠的谎言，

打开那感性的普通人

大脑中浪漫的谎言

打开那些拥有摩天高楼的

权贵们的谎言；

没有国家这种东西

也没有人孤独地生存；

无论平民或者警察

饥饿不允许我们选择；

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亡。²³⁹

新华文学对于战争记忆的书写，亦充满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实际遭遇的苦难之深切关怀。尚未有明确定论“数字”是为对于历史真相的不懈追问，而战争中失语的女性、被边缘化的母亲、慷慨赴死的义士、无法开口的罹难者等一个个切实存在的个体，得以通过文字的记叙还魂，借由文本的声音发声，一方面同过去的历史对话，一方面向未来的历史延展。亲历战争的作家曾沉痛地呼喊：多少善良的人民，就那样地被残杀了。多少无辜的骸骨，就那样地没有踪迹了！当年那些残杀人类的刽子手，握血刀的手臂却没有松软；那些出生入死反抗暴

²³⁸ 汤姆·戈·帕尔默著，吴荻枫译《和平与爱：战争并非不可避免》（海口：海南出版社，2018），页194-195。

²³⁹ Edward Mendelson eds., *W.H. Auden Selected Poem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88.

力的英雄，却依旧被人遗忘；那些自称为“公理的审判者”，只记得鸡鸭猪犬不能“虐待”，却忘了一条条被屠杀的生命，是在怎样可怜的哀号，哭泣，抽搐着死去。²⁴⁰数十年后，身处跨世纪节点的小说家在史料展览厅与日资百货公司间，忧虑地写下蒙尘的历史现状与荒谬的来世想象。过去与未来之间，亡灵与生者之间，热血与冷感之间，如何面对战争的创伤，如何解释自身的形成和存在，如何应对“记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叩问，对于这些仍待探寻且必须探寻的课题，在继续追溯与铺展新华文学所记叙的战争记忆的过程中，许能找到一些线索与体悟。

²⁴⁰ 姚紫<血的纪念碑>，见《杂文，这支部队：姚紫杂文集》（新加坡：陈龙玉，1987），页66-67。

参考文献

文本

丁倩<一个日本女间谍>，见李选楼主编《一个日本女间谍：新马反法西斯小说选集（抗战时期）》，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20。

郭宝崑<灵戏>，收录于柯思仁，潘正镭主编《郭宝崑全集·第三卷》，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

老蕾<弃家者>，见《一个日本女间谍：新马反法西斯小说选集（抗战时期）》，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20。

流冰<云翳>，见方修编《流冰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有限公司，1979。

流冰<在血泊中微笑>，见李选楼主编《一个日本女间谍：新马反法西斯小说选集（抗战时期）》，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20。

苗秀《火浪》，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

苗秀<红雾>，收录于刘笔主编《苗秀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

苗秀<忌日>，收录于刘笔主编《苗秀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

苗秀<太阳上升之前>，收录于刘笔主编《苗秀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

希尼尔<布拉岗马地>，收录于《退刀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8。

希尼尔<横田少佐>，收录于《退刀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8。

希尼尔<认真面具>，收录于《退刀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8。

希尼尔<退刀记>，收录于《退刀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8。

希尼尔<异质伤口>，收录于《退刀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8。

希尼尔<我的来世不是梦>，收录于《退刀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8。

姚紫《窝浪拉里》，新加坡：天马图书出版公司，1965。

姚紫<秀子姑娘>，见《华文文学》，第8期，1987。

岳野<风雨三条石>，见赵戎、苗秀、钟祺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七集·剧本》，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

赵戎《芭洋上》，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2006。

中文论著

阿尔多·罗西著，黄士钧译《城市建筑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阿莱达·阿斯曼著，袁思乔译《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安敏成著，姜涛译《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保罗·利科著，李彦岑，陈颖译《记忆，历史，遗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比库·派瑞克<多元文化中社会民族身份的界定>，见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

恩主编，刘泓，黄海慧译《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布鲁斯·林肯著，晏可佳译《死亡、战争与献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陈鸿瑜《新加坡史》，新北市：台湾商务，2017。

陈世骏<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见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

陈雁《性别与战争：上海 1932-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达比著，张箭飞，赵红英译《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大沼保昭著，宋志勇译《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德兰迪·伊辛著，李霞，李恭忠译《历史社会学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段义孚<森林环境>，见段义孚著，志丞，刘苏译《恋地情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新加坡：万里书局，1974。

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新加坡：东艺印务公司，1978。

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傅葆石著，张霖译《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弗朗兹·法农著，万冰译《全世界受苦的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编，陈引驰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

郭宝崑<和幽灵说话>，收录于柯思仁总编辑，陈鸣鸾主编《郭宝崑全集·第六卷》，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7。

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赫尔曼著，施宏达，陈文琪译《创伤与复原》，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何铭生（Peter Harmsen）著，季大方，毛凡宇，魏丽萍译《南京 1937：血战危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见王政、张颖主编《男性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陈川译《战争论》，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

卡斯腾·哈里斯著，申嘉，陈朝晖译《建筑的伦理功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廖炳惠著《关键词 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流冰<和平还是战争>，见《流冰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有限公司，1979。

流冰<抗战中的侨生态问题>，见《流冰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有限公司，1979。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运，王智新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

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罗伯特·莱顿著，魏澜，纳日碧力戈译《秩序、失序与战争：社会适应与社会信任》，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

密茨凯维奇著，易丽君，林洪亮译《塔杜施先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敏慧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苗秀<文学创作第一课>，见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

南洋商报《新加坡一百五十年》，新加坡：嘉华印刷有限公司，1969。

尼采著，陈涛，周辉荣译《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帕特里克·格里著，罗新主编《历史、记忆与书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邱新民《日本占领新加坡史话》，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1990。

热拉尔·诺瓦里埃尔著，陈玉瑶译《国家、民族与移民：迈向权力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战争中没有女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沙玛著，胡淑陈，冯樾译《风景与记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史密斯（Smith, A.D.）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苏菲《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

汤姆·戈·帕尔默著，吴荻枫译《和平与爱：战争并非不可避免》，海口：海南出版社，2018。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2004。

王东妹<一副战乱时代的生动画卷——论苗秀长篇小说《火浪》>，见符和水，李选楼编《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4。

W.J.T. 米切尔<帝国的风景>，见米切尔编，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王赓武著，林纹沛译《家园何处是》，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吴彦鸿《新加坡风土志之二——名胜古迹》，新加坡：宏砚工作厅，2021。

西蒙·沙玛著，胡淑陈，冯樾译《风景与记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希尼尔<跨世纪的华丽与苍凉>，见《退刀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8。

锡尼萨·马莱斯维奇著，田宏杰等译《战争与暴力的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姚紫<血的纪念碑>，见《杂文，这支部队：姚紫杂文集》，新加坡：陈龙玉，1987。

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

詹姆斯·希恩著，贾青青，李想，刘辛未译《暴力的衰落：战争与和平，现代欧洲的转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张松建<记忆书写的诗学与政治——希尼尔小说综论>，见《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

张宪文主编，马振犊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六十五册 南京保卫战军宪警阵亡名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张英进著，秦立彦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

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赵戎《赵戎文艺论文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0。

期刊

洪镰德<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挑战与定位>，见《台湾国际研究季刊》（第7卷第2期，2011），页104。

胡传荣<战争与和平：社会性别视角的剖析>，见《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3期，页49-50。

胡澎<性别视角下的“慰安妇”问题>，见《日本学刊》（第五期，2007），页119。

报章

刘思<回顾>，见《南洋商报》（新加坡），1940年4月15日，页22。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400415-1.2.124.1>

官方网站

新加坡旅游局官网：

<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history/memorials/civilian-war-memorial/>

英文论著

Books

Adam Jones. *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United

- States of America: Norton Paperback Edition, 1986.
- Aleida Assmann. "From Collective Violence to a Common Future: Four Models for Dealing with a Traumatic Past", in Martin Modlinger and Philipp Sonntag eds., *Other People's Pain: Narratives of Trauma and the Question of Ethics*. Ber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 Benedict Anderso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8.
-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Cambridg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4.
- Daniel C. Maguire. *The Moral Choice*. New York: Doubleday, 1978.
- 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 Derek Summerfield. "Addressing Human Response to War and Atrocity", in Rolf J. Kleber, Charles R. Figley and Berthold P. R. Gersons eds., *Beyond Trauma: Cultural and Societal Dynamics*. New York: Springer US, 1995.
- Douglas C.D. Pocock. "Imagin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Geographer" in Douglas C.D. Pocock,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 Essays on the Experience of Place*.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Edgar Snow. *The Battle for Asia*. Canada: Random House, 1941.
- Edward Mendelson eds. *W.H. Auden Selected Poem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 Grayzel Susan. *Women's Identities at Wa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 Jean Bethke Elshtain.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Kenneth Clark. *Landscape Into Art*.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
- James Fentress,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1992.
- Joseph Kennedy. *British Civilians and the Japanese War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7.
- Linda J. Nicholson. *Feminism Postmoder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Marguerite R. Waller, Jennifer Rycenga. *Frontline Feminisms: Women, War,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Mark Stille.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2, The Fall of Britain's Empire in the East*.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16.

Martin Shaw. *War and Genocide: Organized Killing in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Olive Schreiner. *Woman and Labour*. London: Adelphi Terrace, 1911.

Patrizia Viol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Alastair McEwen. *Landscapes of Memory: Trauma, Space, History*. Oxford: Peter Lang AG, 2017.

Rachel Eng, Syafiqah Jaaffar, Iskander Mydin. *Dislocations: Memory & Meaning of The Fall of Singapore, 1942*.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2022.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Robert Jan van Pelt. "Athenian Assurance", in Robert Jan van Pelt and Carroll William Westfall. *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in the Age of Histor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Ron Eyerman. *Memory, Trauma and Identity*. Switzerland: Plagrave Macmillan, 2019.

Stuart Hall. "Who Needs 'Identity'?" 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Susan Brownmiller.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5.

Journal Articles

Bagley, Clarence B. "Chief Seattle and Angeline." *The Washington Historical Quarterly* 22, no. 4 (1931): pg. 225.

Lucinda J. Peach. An Alternative to Pacifism? Feminism and Just-War Theory,

Feminism and Peace (Spring Vol.9, No.2, 1994.): p.152-153.